

# 目 录

前 言 1

## 第一章

对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1

## 第二章

交换纵横谈 25

## 第三章

世界的时序 52

附录：终天之见 81

——介绍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

# 第一章

## 对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抱负颇大而力有未逮的长篇著述，我是在1950年开始运筹的，至今已有些年头了。吕西安·费费尔(Lucien Febvre)给我出了这个题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友好地强加于我的。当时，他拟就了出版一套通史丛书的计划，总题为“世界之命运”(Destins du Monde)。作为主编的他于1956年过世了，我不得不接续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其困难自不待言。吕西安·费费尔自告撰写《15世纪至18世纪的西方思想与信仰》。此书本应配合与补充我的那本，与之比翼，然不幸却永无出刊之日了。我的著述因此终古成为孤篇。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尽管大体上只限于经济领域,却仍然给我带来了不少难题,这是由于所须运用的资料浩大而繁多,由于其主题引发着诸多争议——经济,作为孤立的自在体,显然是不存在的,还由于不断演进的编史业务无休止地生发着困难,因为它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虽然相当缓慢,却必须将人类其他的科学收录归案。我提到的这个编史业务不断推出新的史料,年年岁岁面貌不同,我们要跟上它,必须跑步前进,必须打乱我们惯常的劳作,必须多多少少地适从那些从不相同的规定与请求。美人鱼以其动人的歌吟诱引船夫触礁,使他们不得前进,而我呢,也被上述美人鱼歌声般的新史料迷住,甚感赏心悦耳。就这样,时光年复一年地流去,我曾一度气馁,不知我的航船能否抵达口岸。我写《地中海史》,历时 25 年,写《物质文明》也花了近 20 年的时间。耗时确实太多了,过分地多了。

## 第一节

现今才正在修纂的、以经济为门类的历史遭遇上一些偏见:它不是高品位的历史。吕西安·费弗尔新撰修的才被视为高品位的历史:见诸于其笔端的不是雅科布·富格尔(Jakob Fugger)<sup>①</sup>,而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sup>②</sup>,而是弗朗索瓦·

---

① 雅科布·富格尔(Jakob Fugger):德意志一个大实业家族(延绵 14、15 和 16 三个世纪)中一位重要成员。该家族所办的企业是资本主义初期贸易公司的典范。

拉伯雷(François Robelais)<sup>②</sup>。与另一门类相比,不管它的品位是高,是不高,还是不太高,经济史同样提出了我们这个专业所固有的一切问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审视,经济史就是人类整个体的历史。它是人们视之为大角色的人物,如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sup>③</sup>,如约翰·劳(John Law)的历史<sup>④</sup>;它是大事件的历史,是情势和危机的历史,它也是整体与结构长期缓缓演变的历史。而这,恰恰正是我们的难处所在,因为,我们涉及的是四个世纪和整个世界,如此大量的事实和解释,怎样组织才好呢?必须进行筛选。就我而言,我选择了长期形成的深层次的均衡与失衡。在产业革命前的经济中,依我之见,首要的义理就是当时那种仍然是初级的经济所蕴含的刻板、钝滞和艰涩,与一种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有限的、参与人数不多的、然而却活生生、强有力的运动共存共处。一边是村落中的农民,他们过着绝少与外界来往、几乎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另一边是正在伸展着的市场经济与

---

②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人,16世纪欧洲宗教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的创始人。在基督教历史和西方文化史上都是重要人物。

③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obelais 1483--1553):法国作家。他的渊博的人文主义学识为他赢得了终身声誉。他对法、英两国的一些作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④ 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 1395--1456):法国商人,国王查理七世的顾问,曾任国家财政总监。科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体现了商人中等阶级的兴起。

⑤ 约翰·劳(John Law 1671--1729):苏格兰货币改革家,开发了美洲法属领地的“密西西比计划”的制定者。他曾在巴黎创办一家有权发行纸币的银行。

资本主义,它们在蔓延,在一点一点地铸造着并且也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总之,至少有两个天地,两种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实体却又互成因果。

我想首先谈一谈钝滞现象。这东西看上去一眼是看不大明白的,处于人的清醒意识之外。人在钝滞的状态中,被驱动的成分远较能动成分为多。这就是我的著述第一卷所试图凑合着解释的东西。在1967年初版时,我曾将此卷题之为《可能的与不可能的:面对着日常生活的人》,尔后又改成《日常生活的结构》。当然,书名无关宏旨。即使这种追寻看来没有把握,处处可能出现漏洞、陷阱和误区,研究的对象却是再清楚不过的。说实在话,一切使用过的字眼——无意识、日常性、结构、深层——其本身就是隐晦不易懂的。关系到我们这个题目,答案不可能就是心理学中的无意识,虽然这个无意识与此也有关连,虽然有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许值得了解一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sup>①</sup>研究集体无意识的实质,被折磨得好苦。言归正传,钝滞这个大题目,少有不从其短处涉及的。它仍等待着历史学家来研究它。

至于我,仍执著于具体的标准。我起步于日常生活,起步于那些生活中对我们尽责、而我们竟不知晓的东西:习惯

---

<sup>①</sup> 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许多论点。1916年发表了《无意识心理学》。后来提出了无意识和原始意象等概念。

——称为老套数更好——即那些千般万种的自发自止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任何人都不用事先决定是干还是不干，它们确实是在我们充分的意识之外进行的。我认为人的生活一大半淹没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继承下来的，无章无序积累的，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它们帮助我们生活，同时禁锢着我们，在我们整整一生中为我们作出决定，指令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里所说的有外因的挑动与诱动，有内因的冲动与搏动，有模式的照搬，有采取行动的各种方式或者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情况。这些东西有时候，甚至常常超出人们的估想，可以被追溯到久远的混沌年代。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混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

这正是我试图用“物质生活”这个方便的——但如同所有的因其义过广而不确切的——词汇所要抓住的一切。当然，物质生活只不过是人类营生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讲，人既有创意，也墨守陈规。但是，我要重复地说一句，在开始的时候，我并未刻意确指这种逆受多于进取的生活所具有的局限及性质。我是想看一看，也让大家看一看这一块平庸度过的、大体未被看清的历史，深入进去，与之熟悉。

钻进去之后，也只有在钻进去之后，才是再走出来的时刻。在进行了这场水底捕捞之后，深刻的、直接的印象是我们仍处在非常古老的水域之中，仍处在一部几乎没有头的

历史之中。两三个世纪以前能够找到的史实，十个世纪以前也能找到，甚至有时今天仍可亲眼看到。我所理解的这种物质生活，人类在其先前的历史进程中已将之深深地融入了自身的性命里，宛如纳入了人的五脏六腑。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

## 第 二 节

此即我首卷书的主线。其目的是进行一番探索。光看标题，各章的内容也就不言自明了。标题如清单般地开列出催化着并推动着物质生活总体前进、而且在此之外或在此之上也推动着人类整体历史前进的隐濛不显的力量。

第一章：“人口数量”。推动人和其他一切生物繁衍生息的因素，乃是杰出的生命之力。乔治·勒费弗尔称之为“向春性”。当然，此中尚有其他的向性和定数。构成人类的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它在个体的人并不知觉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类群体的命运。在这样或那样总的条件之下，人类各大群体的数量或者过多，或者不够多，多多少少，交替产生。人口发展的机理是趋向平衡的，然而臻至平衡的情况颇为少见。在欧洲，从1450年起，人口快速增长，这是因为应该、而且当时也可能补偿上一个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大量死伤。局面得到了恢复，尔后又折

丁损员。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如同预期的一样,人口之潮涨涨落落,落落涨涨,勾画揭示出有倾向性的规律,这些长期规律一直延续到18世纪。至此,不可逾越的界线才被冲破。从那时开始,人口便不断增长,没有停滞,没有反向运动。

总而言之,在18世纪之前,人丁系统被围在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圈子里。人口数量刚要触及到圈子的周边,几乎马上就出现退缩。恢复平衡的方式和时机并不缺乏:匮乏、灾荒、饥馑、苦日子、战争,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种种疾病。现今,疾病仍在为害,而昔日,疾病却是浩劫之灾:定期流行的鼠疫迟至18世纪才被驱出欧洲;斑疹伤寒,再加上严冬,将拿破仑及其大军困于俄罗斯的腹地;伤寒和天花经常肆虐;早先出现在乡村的结核病于19世纪侵入城市,变成了那个浪漫时代的时髦病,最后是性病,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由于几种细菌的结合,梅毒又获得新生,甚至大规模地突发起来。差劲的卫生条件和劣质的饮用水则造成了其他的危害。

人,娇嫩嫩地生下来,怎能逃脱这一切侵害?婴儿死亡率极高,情况如同今天的某些发展中国家,或如同昨天的发展中国家。普通的卫生状况岌岌可危。我们拥有16世纪以来的数百份解剖报告。读后令人震惊不已。报告中对于肢体和皮肤变形及损伤的描述,死者肺部和腹部中超量的寄生虫,能把今天的医生惊呆。所以说,直至不久以前,一种有害健康的生活状况无情地贯穿着人类历史。当我们琢



磨“那时有多少人？”“他们有什么病痛？”“他们能防治吗？”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上述的境况。

第一章之后的章节提出了其他的问题：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都是些没头没脑的问题，不做一次考古勘察恐怕难以作答，因为，你们都知道，传统历史籍册并不记载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而在许久之之前就有这样一种说法：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其食造就其人]，这也许是用德语做文字游戏所得到的趣味之作，然而，我不认为应该将那么多的食品——从糖、咖啡、茶到酒——的出现看作是细枝末节。实际上，它们每每都是说不完的丰富历史。人们无论如何不能过分渲染谷类——古老食品中的当家作物——的重要性。小麦、大米、玉米是非常古老的遴选和无数连续试验的产物，在历时千百年的“导生”（法国最大的地理学家皮埃尔·古鲁的用词）作用下，这些遴选和试验遂成文明的取向。小麦消耗地力，要求土地有规律地休闲，因此它就带动了并且使人们有条件从事畜牧：若是没有家畜、犁具、挽具和大车运输，我们怎能想象欧洲的历史？稻谷是在园艺中培植出来的，一茬接一茬，人们就没有多余的土地放养牲口了。在一日三餐中，煮玉米吃自然是最方便、最简单的饭食了。玉米使人们有了闲暇，因此出现了农民轮流值勤的杂役队，因此才有了美洲印地安人的宏伟建筑。派不上用场的那一部分劳力被社会征用了。此外，我们还可以讨论上述作物在食谱中所占的份额和所提供的热量，

可以讨论历代食谱的不足之处和变化。与查理五世(Charles V)帝国的前途相比,或者与路易十四时代的所谓法国独领风骚的短期而有争识的光辉相比,难道这不是一些同样引人入胜的话题吗?当然,这是些产生过严重后果的话题:酒、烟草等古老兴奋剂的历史,尤其是烟草风靡世界之势,难道不是在警告我们对于今天更具危害性的兴奋剂要倍加警惕么?①

关于技术,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技术确是一部令人赞叹的历史。它和人类的劳动,和人类日常在与天和与己斗争中所取得的很缓慢的进步密不可分。为了做一件工具或造一件武器而磨石、刻木、打铁,或使用猛劲,或和缓而单调地运力,这一切都是技术,历来如此。这不正是一种非常基础的、从本质上讲是保守的、变化缓慢的、由科学(是其迟到的上层建筑)慢慢接应的活动吗?经济上的大规模集中唤来了技术手段的集中和技艺的发展:15世纪的威尼斯兵工厂如此,17世纪的荷兰如此,18世纪的英国亦然。每次风云际会都少不了科学,不管它是如何的稚拙。科学是被硬拉进来的。

一切单项技术,一切科学因素历来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周游世界,传播不断。然而,多种技术的联结体和组合物传播得并不好:光有艏柱舵不行,还要加上搭接法制造的船

---

① 查理五世(Charles V 155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壳,还要给船加上火炮,还要掌握远洋航海术。同样,资本主义是各种手法、程序、习惯、竞争性能的总和。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并未整体传播。是不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才使远洋航行,才使资本主义铸成了欧洲的霸权呢?

好了,也许你们要问我,你为什么要用本卷的最后两章论述货币和城市?因为我不想第二卷中论及此事,就是这样。但是,单单这个理由显然不足以服人。道理在于,货币和城市渗浸于不入记忆的的日常性和最新最近的现代性。货币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发明,在这里,我是把它作为加速交换的手段而谈论它的。没有交换,也就没有了社会。至于城市,史前即已存在。城市乃是最普通生活的古久累世的结构。城市是一些能够适应变化,能够强劲助变的增殖器。可以说,城市,还有货币,造就了现代性,而同时,根据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sup>①</sup>所钟爱的对等法则,现代性,即人类生活中运动着的组合,又推进了货币的扩展,造就了城市日益增强的专制。城市与货币既是发动机,也是显示器;它们引发变化,它们也显示变化。它们又是变化的后果。

### 第 三 节

如此说来,勾勒出辽阔的习惯性、或曰例行性王国的轮

---

<sup>①</sup> 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 1894—1965):法国社会学家,主张社会学应该从整体上来分析社会现象。

廓,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未入青史”的王国。习惯性实际上蔓延人类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生活中扩散传播,如同夜晚的黑暗笼罩着景物。但是,在这种昏暗中,在这种记忆与清醒的短缺中,同时存在着较暗的区域和较亮的区域: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在不动脑筋地按老套行事和意识清醒地作出决定之间,划清界限是很重要的。界限认准了,观察者就得以区分左右,甚至进一步区分上下。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它所拥有的全部初级市场就是一大群销售平平的网点,请你们将之想象为巨大而复杂的网面。我们所称的交换经济始自这些多种多样的出口。生产是个大领域,消费也是个大领域,交换经济就铺展在二者之间。在旧制度<sup>①</sup>所经历的几个世纪中,具体地说在1400年和1800年之间,交换经济仍极不完善。也许,由于渊源不长它尚处于蒙昧时代,反正它做不到将全部产品与全部消费对接起来,因为很大一部分产品被自家或本村用掉了,进不了市场渠道。

在理所当然地顾及到这种不完善的情况之后,我们必须说明,市场经济在进步,它沟通了足够多的乡镇与城市,已经开始组织生产,引导和支配消费。要完善起来,大概需要几个世纪的功夫,然而,在两个世界——产生一切的生产世界和耗损一切的消费世界——之间,市场经济是纽带,是马达,是狭窄但活跃的区域。刺激、活力、新事物、创举、各

---

<sup>①</sup> Ancien Régime, 指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王朝——译注。

种觉醒、增长、甚至进步皆由此涌出。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我却欣赏卡尔·布林克曼的见解，他认为，经济史概括起来就是一部从头至尾的市场经济史。

因此，我长时间地观察、描述我所能触及的初级市场，勾起人们对初级市场的追念。初级市场划出了一条经济界线，标定出一个下限。在市场之外的一切东西只有使用价值，进入了市场狭窄之门的一切东西便获得了交换价值。个体的人是个“因子”，他在初级市场的内与外就决定了他是否被纳入了交换领域，是否被纳入了我称之为的“经济生活”。我说的这个经济生活是与“物质生活”相对而言的，与“资本主义”也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我们下边再讨论。

流动的匠人，走村串镇，干点修椅子或打烟囱之类的活计，虽然是极普通的消费者，却属于市场天地。他是向市场要他那口饭吃的。如果他和他的老家保持着联系，在收获粮食或收获葡萄的季节回村重操旧业，那么，他就又跨越了市场的界线，不过是反向跨越而已。某个人到镇上去，只是为了卖点小商品，一堆鸡蛋，一只家禽，换了钱交税或买个犁铧，这样的人只能说摸到了市场的边。他仍在自产自用的巨大实体内。流动商贩，在城乡兜售数量不多的货物，不管其货流和收支是何等的寥薄，则已归属于交换生活，归属于盘算与借贷一族。至于铺主，干干脆脆就是市场经济的因子。他或者出售自造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个作坊工匠；他或者出售别人的产品，他从此就进入了商人的阶层。店铺总是开着门的，其长处是可以提供连续的交换，而集市每周才

只有一次或两次。再者，店铺进行的已是附有售贷的交易，因为店主可以先进货后交款，也可以先卖货，后收钱。在这里，交易过程就是一个延续的借债与放款的程序。

在集市和交易的初级因素之上，商品交易会和金融交易所发挥高级作用。交易所是每日营业的，而交易会定期举行，每次开放数日，两届间隔的时间颇长。一般来说，交易会也接纳摊贩和中等商人，但是，如同交易所一样，交易会是被大商人统治着的，这些人不管零售，被称为批发商。

我的著述的第二卷题名为“交换纵横谈”。在该卷的前几章中，我花了大量篇幅描绘市场经济的各种成分，试图详察事物，越近越好。我可能过于乐此不疲了，读者则可能觉得冗长。但是，写历史不正是应该首先描绘、直观、分类，少些先入为主吗？自己看，也让别人看，这已经意味着完成了一半任务。看时要尽量亲眼看。我敢向你们保证，我不讲美国，而是说在欧洲，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便是在某座城市的街上看到某种集市，或者看到一个乐于向你讲述其漫游经历的小贩，或者看到一个展销会，或者看到一座交易所。你们可以去巴西(Brazil)的巴侯亚(Bahia)州内地看看，或到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Kabylia)地区，或者去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看看，你们还能亲眼看到古代的市场。还有，如果愿意阅读的话，介绍过去交易情况的资料可就太多了，其中有城市档案，公证人记录，警察的文件和那么多的游记。不消说，画家作品也有表现。

让我们看一看威尼斯的例子。这个城市奇迹般地保存

了原貌，在城里散散步，在档案馆和博物馆转一转，几乎可以把往昔的景象全部复原。威尼斯没有交易会，或者说不再有商品交易会：Sensa 仅仅是耶稣升天节的节日活动，一些商人在圣·马可广场(Piazza di San Marco)搭了售货棚，在圣·尼科洛(San Niccolò)一带卖面具，放音乐，还按惯例表演总督与大海成亲的故事。在圣·马可广场有几个市场，其中包括价钱昂贵的首饰市场，价格也并不便宜的裘皮市场。过去和现在一样，商业大场面呈现在里阿托广场。广场面对着里阿托桥和德国货栈，货栈今天变成了威尼斯的中央邮局。在接近 1530 年的时候，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sup>①</sup>的住宅就坐落在大运河边上，作为消遣，他观赏装载着水果和堆积如山的甜瓜的船只，这些船从环礁湖的岛屿开来，驶向被称为威尼斯“肚子”的新里阿托和旧里阿托连体广场(the double Rialto Square)。那里是一切交易、一切大小生意的活跃中心。在离连体广场吵吵嚷嚷的货摊不远的地方，就是当时大批发商的“洛贾”。这座 1455 年落成的建筑可被视为今日的交易所。每天上午，大批发商们在那里密谈生意：海事保险和运费，购买，出售，相互之间或者与外国商人签合同。离此不远的是钱庄，在狭窄的店内，庄主们正准备通过转账的方式立即交易结清呢！也是在这

---

<sup>①</sup> 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 1492—1556)：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因敢于用文字攻击权贵而受到全欧洲的赞扬。人们说他是“抽打玉公的鞭子。”

附近,菜市和鱼市今天仍然存在。更远一点,是加夸里尼老区的一些肉店,与之为邻的、毁于19世纪末的圣·马泰奥(San Matteo)是肉店老板们的教堂。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交易所的嘈杂——这里我说的是在17世纪——会使我们感到更不自在。何塞·德维加(José de la vega)写过一本令人惊叹的书,题为《乱上加乱》(*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1688)。书中所描绘的股票玩法已很复杂,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根据出售期票和溢股的非常现代的规程,股票买空卖空。今天的经纪人若有兴趣读一读这本书,便会心悦诚服地与之认同。去伦敦一游,在Chang Alley[交易所小路]的著名的咖啡馆里,人们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狡诈和险技。

好了,我们不必再罗列下去了。我们舍繁就简,把市场经济册分为二:低者是集市、店铺和商贩;高者是交易会 and 交易所。第一个问题:这些交换工具在哪些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大致解释从15世纪到18世纪旧制度下的欧洲经济之盛衰变迁?第二个问题:通过雷同与反差的对比,这些交换工具在哪些方面能够给我们阐明欧洲之外的经济机制?对此,我们才开始略知一二。我现在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作为本讲的结束。

## 第 四 节

首先谈一谈在15、16、17和18这四个世纪西方的



演进。

15世纪,尤其在1450年之后,经济全面勃兴,城市得利。农产品价格停步不前或者下降,城市在“工业”价格上升的推助下,先于农村启动了。当时,驱动作用来自匠人的店铺,或者说更多地来自城市市场。这一点是确切无误的。这些市场依势行令,予取予求。此次勃兴因而带着经济生活“基层”的标记。

到了下一个世纪,由于其速度得到了恢复(在黑死病流行之前,13和14世纪曾是通畅加速的时期),由于大西洋经济的扩展,当重新启动的机器变得复杂起来的时候,马达的转动已升位至国际商品交易会:有安特卫普(Antwerp,比利时)交易会,贝亨(Bergen op Zoom,荷兰)交易会、法兰克福(Frankfort,德国)交易会,坎波城(Medina del Campo,西班牙)交易会,里昂(Lyons,法国)交易会。里昂曾一度是西方的中心。后来又添了以“贝桑松”(Besanson)<sup>①</sup>命名的交易会。从1579年至1621年的40多年是热那亚人(Genoese)——货币跨国流动的无可争议的行家——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由他们组织的贝桑松交易会运作十分精细周密,专司钱款与信贷交易。雷蒙·德罗韦尔(Raymond de Roover)生性谨慎,不大赞成对事物轻易进行归纳概括,但却毫不犹豫地指出,大交易会的鼎盛之势正是16世纪的

---

<sup>①</sup> 贝桑松(Besanson):法国西部城市,靠近瑞士。当年是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大文豪雨果的诞生地。

一大特点。这是个非常活跃的世纪,它的飞速发展,说到底,是由于经济建筑最顶层的勃勃生机,而且,源源而至的美洲贵金属和驱动大量票据和信贷单快速流通的汇兑和反汇(change et rechange)系统更使这个层面的花木枝繁叶茂。在千般因由的同时作用下,热那亚银行家的这一娇贵易碎的杰作坍塌于16世纪20年代。

17世纪的经营活动,摆脱了地中海这个引力圈,拓展至大西洋的广阔天地。人们常常将这个世纪描绘为经济衰落或停滞时期。话似乎不应说得这么绝对。因为,如果说,16世纪的冲力在意大利等地已经不可否认地停顿下来,阿姆斯特丹倒也不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神奇般地攀升起来的。无论如何,在下面这一点上,历史学家的所见略同:总之,经营活动得以持续的支撑点是商品和基础交换的決定性的回潮,这一切的得利者是荷兰、它的船队以及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与此同时,商品交易会让位于证券交易所,让位于商场。商场比之于交易会如同普通的店铺比之于城市的逢三逢五的集市,换言之,连续不断的供应代替了间断的汇合。这是一段尽人皆知的、常规的历史。不过,交易所并非唯一的成因。阿姆斯特丹的辉煌有可能遮住我们的视线,使我们忽略更为一般的成就。17世纪,事实上,也是店铺繁生之际,是商业川流不息的另一胜利。在欧洲,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店铺遍地开花,建立了密集的销售网络。洛普·德维加(Lope de Vega, 1607)谈及黄金世纪的马德里时说:“在那里,一切都变成了店铺。”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 18 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证券交易所扩展了它们的活动,伦敦模仿职权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取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越来越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在此环境中,商品交易会自然沦为输家:鉴于其天职在于通过施予财税等优惠促进传统的交易,在做买卖和筹措信贷都很方便的时期,交易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然而,情况不尽相同,在生机勃勃的地方,交易会开始式微,在传统经济仍踟躇不前的地方,交易会则得到发展与维持,因此,列举出 18 世纪的活跃的交易会,实际上是告诉你那里是欧洲经济的边缘地区:法国的博盖尔(Beaucaire)交易会地区,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地区(博尔扎诺 Bolzano)或南部地区,还有巴尔干(Balkans)、波兰、俄罗斯,再往西,越过大西洋,便是新大陆了。

在这个消费与交易增长期,城市的初级市场和店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活力,这是不言自明的。店铺怎能不向乡村蔓延?连流动商贩也拚命活动,花样翻新。最后,英国史籍称为的“隐蔽市场”发展起来了。“隐蔽市场”是与“公开市场”相对而言的。公开市场受到严厉的市政当局监视,而隐蔽市场则逍遥法外。远在 18 世纪之前,隐蔽市场在全英国开始向生产者直接采购,经常是预购,例如,在市场之外向农民买羊毛、小麦、粗布等。这实际是违反传统的

市场规章而建立的一条自主的、极长的、行动自由的而且是肆无忌惮地利用这种自由的商业链。这此链条,借助于军队和大都会所需之巨量供应,以其高效争得了自己的地位。吞食这些供应物的伦敦的“肚子”和巴黎的“肚子”最终竟起了革命性的作用。总之,18世纪在欧洲发展了一切,其中包括“反面市场。”

这一切都发生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谈论了欧洲。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从自然而然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眼界出发想把一切都归宗于欧洲独特的生活,而是由于历史学家这个行当在欧洲得以发展,历史学家们都专心于自家的过去。近几十年来,方向有了倒转。在印度,在日本,在土耳其,资料源得到系统地开发,我们开始从旅行家的报告或欧洲历史学家的著作之外的途径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足以允许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以上所介绍的仅局限于欧洲范围内的交换机件也存在于欧洲之外的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和日本,那么,我们能不能用来作一番比较性的分析呢?如果可能的话,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大致给非欧洲地区定下一个与欧洲相比而言的坐标,在于看一看二者在19世纪不断加深的鸿沟是否在产业革命之前已见端倪,看一看欧洲,当时是否比世界其他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首先看到的是:到处都出现了市场,甚至在黑非洲刚刚成型的社会,甚至在美洲印地安人的各个文明地区。更不必说在那些非常充实的、发达的社会,这些社会密布着初级

市场。只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当年的这些市场便如同是呈现在我们眼前一般,还是活生生的,或者说,是很容易恢复其原貌的。在伊斯兰国家,城市差不多将农村的市场劫掠殆尽。正如在欧洲那样,城市将农村市场吞灭了。这些市场中规模最大者在宏伟的城门前的非乡非城的空地上铺展开来,一边是城里人,一边是农民,他们便汇合于此等中立地盘上。就是在城里,市场竟也挤进了狭窄的街道和空地:顾客可以买到当天新鲜的面包,一些商品,还有——这一点与欧洲的习俗不同——许多菜肴和饭食:肉丸子、烤羊头、炸糕、点心。大商业中心既是集市,亦是店铺的集中地和欧洲式的中央菜场,阿拉伯人称之为 fondouk(丰都克), bazar(巴扎),在伊斯坦布尔则叫做 Besestan(室内市场)。

在印度,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独特之处: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市场,这是因为有一种客观需要,即通过巴尼亚商人的介入将全村的实物佃租转化为货币佃租,或者上交给“大莫卧儿”(Great Mogul)<sup>①</sup>,或者上缴给他手下的王爷。这些乡村市场构成了一片脉络不清、中心不明的云团,此中所见,是不是由于印度城市的把握力不足?还是应从另一面设想,巴尼亚<sup>②</sup>商人开辟的是某种隐蔽市场,抓货源一直抓到村子里?

---

① 莫卧儿(Mogul):16世纪早期至18世纪中期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穆斯林莫卧儿王朝。大莫卧儿即首领。

② 巴尼亚:印度的一个民族,善于经商,被称为印度的犹太人。

在初级市场的层面上,组织得最令人惊讶的肯定是中国了,其布局几乎达到了数学般地准确。先假设一个镇子,或一座小城。请在一张白纸上划一个点。点的周围坐落着六至十个村子,村与镇的距离可使农民当天走个来回。这个几何体——十个点围着一个中心点——我们称之为乡,即一个镇子市场的辐射区。在实际运作中,镇上的市场形成了按街按片经营的局面,零售、放高利贷、代书人、小食品、茶馆、酒馆等都有各自的经营区。斯金纳(G. William Skinner)说得对,中国的农村世界不是在村的模子里,而是在乡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同样,你们很容易懂得,镇子围绕着城市运转,与城市的距离适中,供应城市之需,并通过城市与远处沟通,得到本地不出产的商品。这一切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有个事实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各镇与中心城市的集市日期安排得互不重复。从一个集到另一个集,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商贩和匠人赶赴不息,因为,在中国,匠人的铺子是流动的,你只能到集市上去找他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到家里干活。总之,互相联结的、皆受监督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网络布满了并活跃在中国大地。

店铺和流动商贩都数目繁多,生生不息。但是,缺少了高级机件——商品交易会 and 证券交易所,倒也有那么几个交易会,但都是边缘性的,在蒙古附近或在广州,给外国商人开的,这也是监督他们的一种方式。

个中的因由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政府反对这些高层次的交易形式,或者初级市场的毛细血管式的流通对于中国

经济来说已经够用的了,不再需要动脉与静脉了。出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因,或二者兼而有之,中国之(商品)交换是一方无峰无丘、削平了的地盘。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重大原因,这一点我们在另一讲中还将论及。

在日本,交换的上层有着更好的构架,大商家的网络组织得很完善。在南亚诸岛,交换的上层也存在着更好的构架。南亚诸岛自古便是经商的十字路口,那里有定期的商品交易会,有证券交易所。这里所说的交易所,就像是在15、16世纪或更晚一点欧洲某地大商人每日聚会那样的场合。譬如在爪哇岛上的万丹(Bantam),<sup>①</sup>每日集市结束时,批发商便在城市的某广场碰头。在很长的时期内,甚至在1619年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旧称)建城之后,万丹一直是爪哇岛上最活跃的城市。

印度是杰出的交易会之国,印度的交易会集交易与庙会于一身,往往在进香之地举办。整个印度半岛被这些大庙会搅动得热热闹闹。它们无处不在,规模宏大,值得我们赞美。然而,它们不也是传统经济的特征吗?不也是某种面向过去的表现吗?在伊斯兰世界,交易会也有,但不像印度的那么多,那么大。麦加(Mecca)等几个大交易场所是例外,特殊的例外正好证实了我们所得出的带有普遍性的结论。穆斯林(Moslem)城市异常发达,异常有活力,拥有高级层面的交换机制和工具。可转让的票据与印度一样流

---

<sup>①</sup> 万丹(Bantam):爪哇苏丹王国的旧城,现为废墟。

行,和现款一样通用。信贷网把穆斯林城市与远东连在一起。1759年,一位英国旅行者,从印度回国,途经巴士拉(Basra,现属伊拉克)前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土耳其)。他原来就没打算把钱存留在苏拉特(Surat,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现在便将两千皮阿斯特现金交付给巴士拉的一家钱庄,庄家用“混合语”(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希腊、阿拉伯、土耳其等国语言的混合,通用于地中海某些港口)给他开了一封致阿勒颇(Aleppo,叙利亚)一家钱庄的信件。理论上,这位旅行者可从中获利,但他没有得到企望的数目。任何人都做不到回回赚钱。

综上所述,如果将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相比较,欧洲经济更为发展的原因看来是在于其工具与建制的优势,即拥有证券交易所和各种形式的信贷。不过,交换的机制和技巧,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欧洲之外,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发展和利用。欧洲之外的地方,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等级:接近上层的有日本,南亚诸岛和伊斯兰国家可能也算得上,印度肯定也在这个水平上,因为它拥有巴尼亚商人发展起来的信贷网,制订了向风险企业借款的政策,建立了海运保险业。处于下一层的是习惯于自给自足的中国。最后,在中国之下的则是仍处于原始水准的成千上万的经济区段了。

把世界各国经济划分等级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在下一章,当我试图评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所占据的地位时,我将引用此一级差。竖着排队有助于分析取得成果。处于日



常物质生活巨大实体之上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布下了一张张罗网,维持着各类网络的生机。在以本义而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惯常是在这个层面上繁荣起来的。可以说,在一张真正的立体地图上,世界经济呈现得清清楚楚。

## 第二章 交换纵横谈

在上一讲中，我指明了从 15 世纪至 18 世纪一个巨大的自身消费领域所处的特有位置。从本质上说，这个领域与交换经济完全没有关连。直到 18 世纪，甚至更晚，即使最发达的欧洲也有漏洞，这些漏洞就是很少参与整体生活的地区。它们与外界隔绝，固执地过自己的日子，几乎完全处于封闭自守的状态。

今天，我想谈一谈交换之本义，谈一谈我们给“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下的定义。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两类活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直至 18 世纪仍是势单力

薄的，人类行动的主要部分被包含、淹没在物资生活的广大范畴中。如果说市场经济在扩展，已经覆盖了很广阔的地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它却常常缺乏厚度。我或对或错地将欧洲旧制下的现实称作“资本主义”，它属于一个光辉的、精良的、但是狭窄的层次，它还拢不住经济生活的全部，没有创造出——例外正可证实规律——独有的、自身趋于普及的“生产方式”。这个资本主义通常被人们叫做商业资本主义。它还远远未能抓住和左右整个市场经济，尽管市场经济是其不可或缺之先决条件。然而，话又说回来，资本主义在国内、国际、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很明显的了。

## 第一节

我在第一章中已经给你们谈过的市场经济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历史学家们实际上赋予它一个显赫的地位。大家对它皆优厚有加。相比之下，生产与消费则是勘察得仍然很不充分的大陆，对它的研究从数量而言仅属起步而已。了解生产与消费天地并非易事。相反，市场经济是不断被谈论的对象。它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档案资料——城市档案、经商家族的私人档案、司法与警务文书、商会的讨论记录、公证人的记载……如此这般，叫人怎能不注意它，不对它产生兴趣？市场经济始终占据着舞台。

此中的危险,恰恰在于人们仅仅盯住市场经济,用大量的细节描绘它,使人意会为其存在是蔓延性的、固守不缩的,而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组合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本性只允许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扮演一个联系角色。这也是由下述的事实决定的:19世纪之前,在支撑着它的日常生活的海洋和十回中有五回是自上而下地左右它的资本主义进程之间,它只是一个有些厚度与强度、有时却很单薄的夹层。

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一局限性,感觉明快的历史学家不多。正是这种局限性,通过对市场经济进行的界定,给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指明了它的真正作用。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即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变动,它的起伏,它的危机,其遥远的关联,其取齐的趋向,也就是说,一切使交易量规则的增长变为有形之物的原由都未能蒙骗住他们。库拉有些形象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始终应该注视井底,将视线穿透到水之深层,即穿透到“物质生活”的深层,市场价格可以触及物质生活,却钻不进去,也不是每次都能带动它。因此,一切不在两面——即井口和井的深层——着笔的经济史恐怕就是极其不完整的了。

这一点讲明之后,我还要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从15世纪到18世纪,市场经济这个快速生活区不断拓宽。拓宽的征兆,证明拓宽的标记,这就是市场价格越过空间呈现出的连锁变化。在全世界,在对此已有许多观察

的欧洲，在日本，在中国，在印度，在伊斯兰国家（也在土耳其帝国），在美洲，特别是美洲的那些贵金属已发挥早期作用的地方，如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鲁，价格都在变动。这些价格呼应得或好或坏，起伏相随的差距有大有小，在整个欧洲，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相互钩连着，价格差距微乎其微，但相反，拿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的印度来说，与欧洲相比，价格上至少有 20 多年的差距。

总之，说好也行，说坏也行，某种经济已将世界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这种经济牵动的只是几种特殊的商品，也牵动着已经周游世界的贵金属。用美洲白银铸造的八字硬币横渡地中海，穿越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到达了印度和中国。从 1572 年起，经过马尼拉中继站，美洲的白银跨越了太平洋，通过这条新路，又一次抵达中国，完成了它的旅程。

这些实质性的联系、联营网络、买卖和运输，怎能不吸引历史学家的视线？在这些事物的景象面前，当时的人们为之惊愕，今天的历史学家亦为之惊愕。甚至人类史上的第一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也正是市场的供与求吗？目不转睛的市政当局，它们奉行的经济政策，不正是监视其市场，监视其市场的供应及市场的价格吗？一国的君王，当他采取的行动形成了某种经济政策的时候，该政策所涉及的不正是理应保护的国内市场和国籍旗帜吗？所涉及的不正是与国内外市场紧紧相连的、理

应推动的民族工业吗？只有在市场这块狭窄而敏感的区域才有可能并顺理成章地行动起来。正如实践天天显示的那样，已经采取的措施在市场这个区域内都能得到反响。这终于使人们或对或错地相信，交换起着决定性的、平衡的作用，使人们相信，交换通过竞争可以铲平水准差，调理供求关系，相信市场是一尊看不见而甘尽义务的神明，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sup>①</sup> 称之为的“无形的手”，相信 19 世纪的自动调节的市场是经济的拱顶石，如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话。

在这些论调中，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坏心，也有一份幻想。有多少次，市场被扭曲了！有多少次，价格被实际存在的或合法的垄断集团专横地确定了！这一点能够忘记吗？特别是，姑且承认市场（“市场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一台电脑”）的竞争效能，但至少应该指明，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市场仅仅是个不完善的连接件，光是它的“局部性”就足以说明它是不完善的了。我们要强调的字眼是这个“局部性”。诚然，我信奉市场经济的效能和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独辖一切。事实虽然如此，然而直至比较接近我们的时代，经济学家仍只从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实践

---

<sup>①</sup>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 - 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第一部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大著作。他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认为自由竞争就会增加国民财富。

推理。杜尔哥(Turgot)<sup>①</sup>认为,流通就是经济生活的整体。同样,远在杜尔哥之后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sup>②</sup>眼中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条很狭窄的、但很急湍的河流。诚然,50余年以来,在经验的教益下,经济学家们不再为放任主义的自动效能辩护,但是,在当今的舆论和政治讨论中,这方面的迷信仍然没有消除殆尽。

## 第 二 节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并不总是被认可的。在关于此一时期的讨论中,我竟然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所需要的词汇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另一个字眼,用以指明一些显然不同的活动。我的意图决非引狼入室。历史学家已反复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且用得恰如其分,因此,当我也使用了它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个战斗的字眼是暧昧的,可怕地载满了现实意义,也很可能潜含着年代的颠倒。置一切慎重

---

① 杜尔哥(Turgot, 1727 - 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在位时曾任财政总监,试图进行经济大改革,取消了内部关卡,主张商业与工业自由,由于阻力巨大,终遭失败。

② 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 - 182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居于领导地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起了他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分析了社会中三个阶级,即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规律。他使经济学的研究系统化了,然而他把经济学的范围规定得比亚当·斯密狭窄的多。

于不顾，我给“资本主义”这个词打开了大门，个中倒也  
有些因由。

首先，在15至18世纪这一时段，某些进程需要有一个  
特定的叫法。当人们细察这些进程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  
将它们大而化之地列入普遍的市场经济之中，实属荒唐。  
在人们脑子里自然跳出的字眼就是“资本主义”。你会觉得  
词不达意，对它恼火至极，将它扫地出门，它却几乎立即越  
窗归返。因为你找不到替代它的合适字眼，这种状况是很  
凸显的。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Andrew Shonfield)所说  
的，“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不论如何声名狼藉，还得使用，最  
大的理由就是人们毕竟没有找出替代它的词汇。无疑，“资  
本主义”一词是有弊病的，它总引起来不可胜数的争吵和辩  
论。然而，这些争吵，无论是好的、差一些的或是废话连篇  
的，实际上都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可能不理这些争吵而行事  
或讨论问题。该词最大的弊病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赋予了  
它另外的意思。

“资本主义”一词，从20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我也  
可能有点武断，不过我认为，1902年出版的威纳尔·桑巴特  
(Werner Sombart)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是该词正式出台之时。实际上，马克思(Karl  
Marx)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可能  
直接犯下最大的过失：时序颠倒。有一次，一位年纪尚轻的  
历史学家喊道，在产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讲资  
本嘛，有的。讲资本主义，没有！”



然而,在过去——甚至遥远的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跃变,或者,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说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没有沾染。往昔的所为不断延伸到现时生活中来,也不断扩充它。由此,许多历史学家,且不是平庸之辈,今日都意识到,产业革命远在十八世纪之前已初见端倪了。说服自己相信古今无断裂的最佳论据或许就是今天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景象。它们试图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模式,但它们却受挫了。总之,这个无休无止地被翻来覆去的辩证关系——过去,现在;现在,过去——恐怕正是历史本身的核心,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 第 三 节

“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义。“资本”是可触知的现实,是一整套容易鉴别的资源,处于无休止的运作中;“资本家”是筹划或试图筹划将资本纳入连续不断的生产进程之人,对于此一进程,一切社会皆仰赖系之。“资本主义”,大体上(也只能是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这种营营不息的行事方式。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是资本。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资本”的含义更被强调为“资产”。它不仅指积蓄的钱,还

指先前一切劳动所取得的可资利用或已被利用的成果。一幢房子是资本,入仓的小麦是资本,一艘船、一条公路也是资本,但是,一项资产,只有当它参与再生产的进程时,才称得上资本,金库里不使用的钱便不再是资本,同样,不开发利用的森林也不是资本,以此类推。这一层意思就说到这里,那么,就我们所知,难道真有一个社会未曾积累过、也不去积累资产,不把资产有规律地用于劳动生产,并且不通过劳动重建资产,不使资产开花结果吗?在15世纪,西方最简陋的村庄也有它的道路,也有清除了石块的田野、种了庄稼的土地、筹划安排的林子、磨房、存粮……欧洲旧制度下各国经济的统计表明,一年劳动的毛值与资产总体(在法文中我们称为 *patrimoine*)之间的比例为一比三或一比四,这也正是凯恩斯(Keynes)所认可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应有的比例。如此说来,每个社会都积累了三到四年的劳动成果,储存在一边,用以进行顺利的生产。当然为此只是动用部分的积累,决不会动用百分之百的积累。

这些问题暂时讲到这里。你们对此和我一样熟悉。好了,我现在该给你们解释的只剩下一点了:我如何才能有根有据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当然,你们不会期待我作出下述这种毫不含混的区别:一层是水,另一层是浮在水面的油。经济现实永远不可能支撑在简单的物体上。你们不难理解,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

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

我把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归入第一种形式(甲)之中:譬如说,小麦和木材流向附近城市;我甚至把范围更广的贸易也归入这种形式之中,只要这些贸易是定期的、可预见的、常规的、向大小商人放开的:譬如,在十七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从革但斯克(Danzig)卖到阿姆斯特丹;再譬如,欧洲从南到北的食油和葡萄酒贸易——我想到了每年到伊斯的利亚(Istria)地区(克罗地亚)采购白葡萄酒的德国大车队。

第一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每个人都了解其来龙去脉,人们也大致承受得起其一贯有分寸的利润。在这方面,一个镇子的市场所提供的便是一个好的典型。它首先汇集的是生产者——农家男女、匠人等——和买主,其中一些人是本镇的住户,另一些是邻村的居民。在买主与生产者之间,不时有中间商出现,最多也就是两三个人。在有机会的时候,中间商通过囤积的手段搅乱市场,支配市场,左右价格。一个小转卖商甚至可能违反规章而去镇口迎堵农民,以低价收购他们的食物,然后高价出手:这是一种初级的欺骗行为,它在乡镇周围,尤其在城市周围普遍地存在着。当这种行为扩展时,便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在一个我们想象的理想乡镇,其贸易是有条例的,是公正的、透明的——如同德国成语“眼对眼,手接手”所说的那样,即使在这里,逃避透明与监督的乙式交换也不可能绝对没有。再如,贩卖波罗的海地区小麦的大型车队所做

的贸易是一种透明的贸易：在始发点革但斯克的价格曲线和在终点阿姆斯特丹的价格曲线是同步的，商人的利润既有保证，亦颇适度。但是，倘若地中海地区发生饥馑，如同1590年出现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代表大客户的国际商人让海轮改变惯常的航线，所载之货运至里窝那(Livorno)或热那亚(Genoa)，价格必然增加二倍或三倍。在此情况下，甲式经济便让位于乙式经济了。

只要在交换中升级，第二种形式的经济便占了主导地位，在我们的眼前便画出了一个显然不同的“流通范围”。英国历史学家指出，从16世纪起，在传统的公开市场——public market——身旁，他们称之为的私下市场——private market——日渐扩大着影响。为了强调二者的不同，我特意把它叫做“反向市场”。说实在话，这个市场不正是寻求挣脱传统市场的那些极为碍事的规则吗？流动的商人；上门的收购人径入生产者的家中。他们向农民直接购买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麦或小麦、家禽等。他们甚至预先订购剪羊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长着的小麦。一张普通的条子，在村子里的客栈里，或者就在农家中，签了字就等于订了合同。然后，他们将收购的货物用车辆、牲口或小船运至大城市或输出的港口。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巴黎四周如此，伦敦四周亦如此，塞哥维亚(Segovia)是羊毛集散地，那不勒斯(Naples)是小麦集散地，普利亚(Apulia)是食油集散地，南亚诸岛(Insulinde)是胡椒集散地……流动商人不亲赴农户的时候，便与卖主在集市的外侧约会，或

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家客栈揽生意:客栈于是成了货流的中继点,运输的驿站。这种类型的交换用个人之间的交易替代了集体市场的正常状况,而个人交易的条件又随着当事人各自的处境而任意变化。在英国,由于对卖主所签具的条子有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大量官司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显然这是些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些交换中,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竞争——大失其位;在这些交换中,商人占了两项优势:其一,他斩断了生产者 and 最终获得商品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了解商业链两头的市场条件,因此,只有他对于可以指望的利润心中有数);其二,他有现款,这是他的主要理由。就这样,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便拉开了商业长链。这条长链的效率保证了它的存在。尤其在大城市的供应方面,由于它有效率,当局对它便听之任之,至少对它放松控制。

然而,这些链条拉得越长便越能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显出来。在远程贸易——Fernhandel<sup>①</sup>——中,它展现得很鲜明,并非只有德国的历史学家从中看到了交换生活的顶点。Fernhandel是个绝妙的自由操作的领域,它长距离运作,这使它不受通常的监视或者避开监视。在有需要的时候,它的行动可由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印度)或孟加拉沿海直至到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直至波斯、中国或日本的某家

<sup>①</sup> Fernhandel:德文字词,意思是远程贸易或长距离贸易。

销售商店。在此广阔的经营区内,它有选择的可能,它选择最能生利的买卖:安得列斯(Antilles)群岛的贸易不是已经利微了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同一时刻,在印度所做的区间贸易或对中国进行的贸易保证了双倍的利润。扛枪的人换换肩就行了。由于远程贸易经手人只有几个,从这些丰肥的利润中便积累起巨额资本。并不是任何人想挤便能挤得进来的。相反,地方贸易分散于众多的受款人之手。譬如,在16世纪,葡萄牙的国内贸易,若论其总量和所料想的全部款额,远远超过胡椒、香料和毒品的贸易。但是,这种内贸经常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表现为使用价值。香料贸易则直属货币经济。只有大批发商从事这种经营并在手中集中了超常的利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笛福(Daniel Defoe)时代的英国。

在世界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伙大批发商从芸芸商人之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这批人的范围很狭小,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总是与远程贸易联系在一起的,这决非偶然。在16世纪之后的德国,在13世纪之后的巴黎,在12世纪之后、可能更早的意大利城市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西方出现第一批批发商之前,伊斯兰国家就有了tayir,即进出口商人。tayir从他们的商号里(已经实行坐商)指挥着经纪人和代理人的活动。tayir和市场里的hawanti——小店主——不可相提并论。印度的阿格拉(Agra),在164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城市,一位旅行者记述道,在那里被称为sogador的人“正是我们在西班牙称之

为商人的人,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则冠以 Katari 这种特殊的称呼,它是这些国家中经商者的最高尚的称号,其意为“极其富有、威望崇高的商人”。在西方语言中的词汇也标明了此类区别。“批发商”——Negociant——就是法国的 Katair;Negociant 一词出现于 17 世纪。在意大利,mercante a taglio(零售商)与 negoziante(批发商)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在英国亦然,零售商是 tradesman,批发商是 merchant,后者在英国的港口首先经营出口和远程贸易。在德国,天壤之别存在于小作坊主(Kra mer)和大商人(Kaufmann 或 Kaufherr)。

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他们很早地、一贯地超越“本国”的界限,和外国商人串通一气。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过操纵信贷,也通过为好钱和坏钱之间进行偷梁换柱的取巧把戏。金币银币值钱,是好钱,用于大宗交易,流向资本;铜币不值钱,是坏钱,用于发工资和日常支付,流向劳动。这些人有着信息、智力和文化优势。他们攫取周围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产、定期租金……他们依仗着垄断或者必要的权势,十居其九能够击败竞争对手。谁会怀疑这一点?一位荷兰商人写信给他在波尔多(Bordaux)的一个伙计,叮嘱他保守他们计划的机密,否则的话,“在这笔买卖上如同在其他许多买卖一样,只要有别人出来竞争,那就无水可喝了!”最后,由于资本雄厚,资本家才得以维持其特权并

包揽了当时的国际大生意。一方面,因为在那个运输缓慢的时代,做大买卖,资金流动的周期必然很长:投入的金额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连同利润收回。另一方面,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大商人不仅仅动用他的资本:他还借助于信贷,即借助于别人的钱。总之,资本是流动的。佛罗伦萨(Florence)附近的普拉托(Prato)城中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第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所遗留下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从14世纪末开始,汇票已往来于意大利各城市和欧洲资本主义热点之间:如巴塞罗那(Barcelona)、蒙彼利埃(Montpellier)、阿维尼翁(Avignon)、巴黎、伦敦、布鲁日(Bruges)……他们的这一套玩艺就像今天巴塞尔(Basel)国际清算银行的绝密会商一样与平民百姓毫无干系。

商品世界或交换世界就这样被严格地等级化了,从最卑微的职业——脚夫、装卸工、小商贩、运输者、水手,到出纳员、店主、各种经纪人、高利贷者,直至批发商。一眼看上去便使人惊异之事,就是专业化,即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职能分解的进程是一种现代化,它首先并且仅仅表现在下层:各种手艺人、店主,甚至商贩都专业化了。但金字塔的顶尖却并非如此,直至19世纪,实力雄厚的商人可以说从不局限于某一种经营活动。当然,他是商人,但从不只干一种行当,他随机应变,一会儿



是船主、承保人、贷款者，一会儿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银行家，甚至是实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巴塞罗那，18世纪的时候，零售商店总是专业化的：出售的或是粗布，或是呢绒，或是香料……财发大了，有朝一日变成了批发商，他就立即从专业化走向非专业化。从此之后，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此种越规行为经常被注意到，但通常的解释却不能令我们满足：人们对我们说，商人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散经营，为的是减轻风险：做红染料赔了，靠香料赚；错过了一桩生意，那就靠换汇或向某农民借钱收息赢利……总之，他遵从一则法国成语的忠告，即“不要把全部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

对此，我认为：

——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其原因在于，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全部的活动拢固。人们往往以为，往昔的资本主义由于缺少资金而财单力薄，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积累才得以枝繁叶茂。然而，商务函件或商会的备查文书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显示，一些资金找不到投入的场所。资本家于是有兴趣置地，土地是保值之物，拥有土地在社会上亦颇光彩，资本家有时也有兴趣购置收益颇丰的、以现代方式进行经营的土地，在英国，在威尼斯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资本家或者受诱在城市倒卖房产，还可能谨慎而再三地涉足工业领地，如进行矿产投机（15—17世纪）。但是，意味深长的是，除了个别例

外，商人对于生产体系不愿入股，而是满足于使用把活计外派到承揽人家中去做的方法，即 putting out 的办法，来控制手工生产，以便保证更好地销售。与工匠和 putting out (putting-out) 系统相比，工场直至 19 世纪只不过是生产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大商人经常更换经营活动，这是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外一个部门转移。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随行情而变。现今也还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适应形势与进行转产。

——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它的成功从未为时长久，好像是经济大厦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这个经济尖端一样。佛罗伦萨银行，曾辉煌一时，但在 14 世纪便败落在巴尔迪 (Bardi) 家族和佩鲁齐 (Peruzzi) 家族手里，到了 15 世纪又改落在梅迪契 (Medicis) 家族手里。从 1579 年起，热那亚兴办的普莱桑斯 (Piacenza) 金融交易会变成了几乎全欧洲的汇划结算所，但是，热那亚银行家非凡的作为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至 1612 年便销声匿迹了。在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独占了欧洲信贷流通的鳌头，但这一番经历到了下一个世纪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到了 19 世纪，在 1830—1860 年之后，金融资本主义才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个时候，银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业，也控制了商品，而且，从总体来说，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茁壮，最终撑得起金融建筑了。

我现在总结如下：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种既狡滑又残酷的明火执仗的乡村资本主义。莫斯科的达林(Viktor Dalin)教授对我说，列宁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若一旦将自由归还给乡村市场，它便能够发育出资本主义的整棵大树。我也不否认存在着由店主们实行的某种微型资本主义。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脱胎于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力量对比可能成形并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层次。但是，归根结底，初始的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是社会的上层。只有在巴尔迪、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s)、雅各布·富格尔(Jakob Fuggers)、约翰·劳(John Laws)或者奈克尔(Neckers)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并或许能了解到什么是资本主义。

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加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和经济进步的充分的展现。其实，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展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企业家奉为天降的神明，我不认为他说得有理。我固执地相信，整体

运动才是决定性的，一切资本的轻重大小首先取决于支撑它的下层经济。

## 第 四 节

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当然，情况并非一贯如此。

一切密集的社会都可被分解为几个“组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级制度。只有与其他“组合”联系起来，渗透到其他“组合”之中并且也向其他“组合”敞开大门的情况下，经济这一块才能被理解。这些“组合”既有单独的行动，也有相互的作用。资本主义是经济“组合”中的一种特殊的和形式的形式。上述的“组合”相互为邻而又相互渗浸，只有以此为据，资本主义方可得到充分的解释。

所以说，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时好时坏。时而允其扩展，时而断其生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得胜之日。在资本主义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正是财主中的佼佼者。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贵族为了生意人、批发商

和出资者的利益,甚至根据这些人的指示来统治国家。在英国,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兰一样。法国则晚了一个多世纪,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资产阶级才稳稳当地地主了政。

国家根据自身的均衡状况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对于金钱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文化与宗教的情况亦然。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但是,教会对此却有些顺应。教会口头上也是不断地说不,到后来对于世事迫切的需求终于说了行。简言之,教会采纳了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为入时),aggiornamento是个较新的用法,当时的说法是modernisme(modernism,现代主义)。奥古斯丁·勒诺代(Augustin Renaudet)回顾说,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 1225 - 1274)确立了第一个应运成功的现代主义。不过,如果宗教,或曰实质上的文化,相当快地撤除了障碍,但却坚持了强烈的原则上的反对,尤其对于有息贷款,将之谴责为高利贷。有人甚至过于匆忙地认定,若没有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顾忌是消除不了的,还认定,这正是北欧国家臻至资本主义的深刻原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从字眼的现代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不多不少就是新教(Protestantism)的产物,或更恰当地说,就是清教主义的产物。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这种难以捉摸的论点,尽管他们做不到将其彻底放弃。此一论点不断在他们面前再现。

然而,该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不过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资本主义中心长期而出色地占据过的位子。它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工商业的操作上,都没有任何创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伦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仿效伦敦一样。此事的关键每次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转移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质。在16世纪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终转移正是一个新兴国家对老年国家的胜利。此外,其规模亦今非昔比了。随着大西洋的兴起,全面的经济、各种交换、货币的储存都扩大了,这也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进展。市场经济忠于阿姆斯特丹的约会,此后便背负起资本主义更大规模的建树。最后,依我之见,马克斯·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开始便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作用,将其视为现代世界的创导者。

但是,实质问题并不在此。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

一切发达的社会都允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几个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们从楼底向上攀登。住在楼底、在贫寒中生息的是基层的大众,即纳尔·桑巴特所说的 Grundvolk。等级分为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钱财的。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级之间,有敌对,有妥协,有同盟。有时甚至混乱不清。在罗马,13世纪的时候,政治等级和宗教等级汇为一体,但是,在城市周围,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而与此同时,教廷的

银行家——即锡耶纳(Sienese)人——也爬到了很高地位。在佛罗伦萨,14世纪末,过去的封建贵族与新起的商业大资产阶级已经合二为一,组成了英气勃发的钱财集团,理所当然地也攫取了政权。相反,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够压倒其他的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与清朝便是如此。欧洲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政体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国那样明显与一贯而已。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威望的角色,而将贵族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穷酸的吕宋(Luson)教区的主教黎世留(Richelieu)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当上了皇太后玛丽·德·美第奇(Queen Mother Marie de Médicis)指导的神甫,由此便直入宫廷并挤进了掌权者的小圈子。

有多少社会便有多少实现个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尽管孤立的个人成功并不少见,历史却频频不休地重复同样的课程,即个人的成功几乎总应记在某些大家庭的账上,这些家庭警觉审慎、专心认真,拚了老命也要一点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影响。他们的抱负与耐心配合,长期铺展。如此说来,是不是应该赞颂一下那些“继世长”的家族,赞颂一下名门的荣光和功德呢?我之所以讲这些,为的是突出我们从总体上称之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是“很晚”才被人们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是

日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牢固的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在实际中,为了确立其财富和势力,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价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们的想象,土地为其拥有者在社会上建立一种显耀的威望。如果你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渊源流长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积累起来的家产和荣誉,你们就差不多懂得了欧洲是如何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家族分享基础财富——土地财富——的一种持久的形式,即一种在其结构中的稳定的秩序。“资产阶级”,延绵几个世纪,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贴近它而又反对它,利用它的错误、奢侈、游手好闲、缺乏预见,经常用高利贷的办法,夺取了它的财产,最终钻进它的行列,然后融合其中。一批资产者这样干了,另一批再接再厉,发起冲锋,重新投入同样的斗争。总之,寄生是长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养肥自己而摧毁统治阶级,在这方面他们决不会罢手的。但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是缓慢的,具有耐心的,其抱负的实现由子孙相继努力,子传于孙,孙又传子,无休无止。

此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自身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状态,它是一种这样的社会:财产、社会特权都相对地受到庇护,由于财产是、至少想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种相对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财产与特权,每个人大体上各归其位。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这样做,资本主义摧毁



面)。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定一个在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被可以称为极权(totalitarian,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意)的国家所制服。中国的真正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

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18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因为土地在这些国家同样属于君王。历史学家使用旧制下的欧洲语言说,在这些国家里,好处(即终生得到的利益)是有的,家族采邑是没有的。换言之,领主权,即土地、乡村、地租,是由国家分配的,如同加洛林王朝过去之所为,受益者一死,领主权重新由国家支配。就君王而言,这是一种酬赏士兵和骑士、保证他们效力的方式。领主一死,其采邑和一切财产便重归伊斯坦布尔苏丹(Sultan of Istanbul)或德里的大莫卧儿(Great Mogul of Delhi)。可以说,只要权在手,这些大君王便能够像换新衣一样地更换统治圈子和精英阶级,这个权,他们不可能不用。社会的顶峰因此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最近有一份研究18世纪开罗的材料告诉我们,大商人无法维系一代以上。

政治社会将他们吞噬殆尽。在印度,商业生活比较稳固,那是因为商业生活的发展处于上层变化无常的圈子之外,处于商人和银行家阶级的护栏之内。

讲了这些之后,你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阐述的相当简单的、也许正确的论点: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就在西方本身,这种殷勤讨好的程度便有差异:由于广泛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譬如与英国相比,法国一直是一个更不赞同资本主义的国家。

我想,这个观点不至引起严重的异议。相反,一个新问题自动提出来了。资本主义需要有一种等级。但是,在一个审视过成百上千个等级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中,等级制度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些社会的顶峰都形成了一小撮特权者和负责人。这便是昨天的现实:在13世纪的威尼斯如此,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之下的欧洲如此,在梯也尔(Thiers)先生的法国也是如此。在1936年的法国,人民群众提出口号,谴责“二百家族”的权力。在日本,在中国,在土耳其,在印度,情况亦然。这仍是今日的现实。甚至在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各种等级制度,它只是利用这些等级而已,正如它并未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晚间来客。当它到达的时候,一切早已安排就绪。换句话说,等级这个问题的本身已将资本主义超越,事先就支配了它。非资本主义社会可

50

惜也未能革除等级制度。

这一切引发着漫长的讨论。在我的书中,我试图对此介绍,不求结论。因为,这肯定是个关键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要不要打碎等级制度?要不要消除人对人的依附?1968年,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说要打碎,要消除。然而,这真的能做到吗?

### 第三章 世界的时序

在以上两章中,我向你们介绍了拼板游戏的构件,或单独地介绍,或成组地介绍,其顺序是出于解释的需要随意而定的,现在可以进行整体拼接了。这正是我的著作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的目标。该卷的题目是:世界的时序。标题本身已亮出我的意图:将资本主义、它的进程以及它的资财与手段和世界总体历史联系在一起。

一段历史,就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所出现的一件又一件成形之物,一桩又一桩的经历。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它在15至18世纪之间浮现并逐渐地令人们感受到它对于人类整个生活、对于世界上一切社会、一切经济和一切文明所产生的影响。而这样一个世界是

在不平等的征兆之下自我肯定下来的。万变不离其宗，今日之景象——一边是富国，另一边是不发达国家——在 15 世纪和 18 世纪之间已经切实存在着。诚然，从雅克·科尔和让·博丹(Jean Bodin)，到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富国与穷国并非一成不变。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了。但是，在其规律之中，世界并没有变：在结构上，它继续分化为富贵与贫贱。世界是一个大社会，它和一个普通的社会一样等级化了，它是一个普通社会放大的、但颇易识别的形象。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归根到底，乃同一结构。为什么呢？这正是我试图解释的，但不一定能讲得清楚。在事物的“如何”和“为什么”之间，历史学家更容易看“如何”，确切一点说，在大问题的“因”与“果”之间，更容易看“果”。当然，惟其如此，历史学家才更执著于发现事物之“因”，而常常却又抓不到它，并且受它的嘲弄。

## 第 一 节

我们需要再一次为词汇明确定义。我们要使用的是两个词组：世界经济和经济世界，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世界经济意为整个世界的经济，也就是西斯蒙第(Sismondi)所说的“全球市场”。经济世界(*économie - monde*)是我根据德文单词 *Weltwirtschaft* 创造出来的，我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的经济。很久以前，我曾写道，单单是 16 世纪的地中海便是一个经济世界。

代之后取代了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中心地区是英国(但不是英国全部)。下一个层次便是中轴周围的中间地区。最后是广袤的边缘地区。在作为经济世界特征的分工中,边缘地区不太能主动参与,而是处于从属的、依附的地位。在这些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常常使人想到炼狱,甚至地狱。它们的地理处境已足以成为这种状况的因由。

这些匆促表述的看法自然需要解释与论证。我著述的第三卷就包含着必要的解释与论证,但是,在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 System*)中你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估计。他的这本书1974年在美国发行,法文版的题目是《从15世纪至今的世界体系》(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甚至在一两条主线上,我与他的意见并不吻合,但这无关紧要,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认为,在从16世纪才建立起来的欧洲经济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经济世界,而我却认为,远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之前,自中世纪,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已经分成一些在不同程度上集中和结构紧密的经济区,也就是说,有好几个经济世界共存。

这些共存的经济体之间所进行的交易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分别占据着地球上的居住空间,而居住空间由相当宽阔的边界地域连接,除了几个例外,横跨如此宽阔的地域做买卖在一般情况下获利不大。在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本身就是经济世界其中的一个,自食其力,也自我封闭。在

18世纪末期之前,巨大的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相反,查理五世帝国或菲利浦二世(Philip II)帝国,虽然幅员广阔,却不是一个经济世界:从其诞生之日起,它便被纳入了由欧洲织成的古老而活跃的经济巨网。在1492年之前,哥伦布(Columbus)尚未远行,欧洲加上地中海,带着伸向远东的触角,也是一个经济世界,其标志便是威尼斯的辉煌。这个经济世界在科学大发现之后扩大了,兼并了大西洋及其岛屿与沿岸,然后慢慢地并吞了美洲大陆腹地。它密切了与其他的当时仍然自主的经济世界——印度、南亚诸岛和中国的联系。同时,在欧洲本身,其重心由南向北转移,转到安特卫普(Antwerp),尔后又转至阿姆斯特丹。请注意,它并没有转向西班牙帝国或葡萄牙帝国的中心,即塞维利亚(Seville)或里斯本(Lisbon)。

这样,我们可以在世界地图和世界演进的历史上放一张透明的描图纸,用铅笔把每一个时代的各个经济世界粗略地划下来。对比之下,我们会看到,这些经济体的变化很慢,我们因此就有充裕的时间研究它们,看它们是如何生存的,掂掂它们的分量。变形甚为缓慢的经济体向我们展示的是一部根深蒂固的世界历史。这部深固的历史,我们只能简单提一提,因为我们在此研究的问题仅仅想说明,欧洲由于其发展而建成的一个个经济世界在哪些方面能够解释或者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机制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我想在此先说一句话:这些经济世界当年正是欧洲的、然后是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模子。接下来,我姑妄相当审慎地,也相

当徐缓地对此予以解释。

## 第 二 节

一部深固的历史。我们不是来发现它的，我们是来强调它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倘若在世，他会说：“我们给它以尊敬。”这已是很了不起的事了。在我依次着重阐述各经济世界的中心变换，即中心偏移，着重阐述每个经济世界都划分为同心区域之后，你们将会相信这一点。

每当出现一个中心失落的情况时，一个新中心的重组过程就开始了。看来，一个经济世界若没有一个重心、若没有一个极，便不能生存下去。但是，老中心的失落和新中心的形成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其关系也就更为重大。就欧洲以及它兼并的地区而言，在14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中心在威尼斯形成了。接近1500年，风雨突然大变，中心从威尼斯乘风降至安特卫普(Antwerp)，接着，在1500—1560年之际，风头又回归地中海，不过，这一次热那亚赢得了风气之先。后来，风向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欧洲区的经济中心在那里稳定了近两个世纪。在1780至1815年间，中心移位于伦敦。1929年，中心横越了大西洋，定位于纽约。

欧洲世界的大钟如此这般地曾五次敲响决定命运的时刻。每一次，中心的移位都是在斗争、对抗、剧烈的经济危机中实现的。通常，最终打垮已经受到威胁的旧中心并



总之，北欧人的得手看来不是由于更好的生意经，也不是由于工业竞争的自然规则（也不是由于他们着手进行的改革，尽管他们确因工资低廉而占据了优势）。他们对于老的得利者的政策无他，就是取而代之，为此而使用强暴行为乃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条法则现今依然如故，难道还用再说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所谴责的使用暴力瓜分世界，并不像他所相信的那样新鲜。这不还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吗？谁处于中心或靠近中心的地方，谁就可以对他人行使一切权力。

这一点提出了已经提及的第二个问题：每一个经济世界总是分成几个同心地区，这些地区离趾高气扬的中心极越远越不利。

光彩，财富，生活之幸福皆汇集于经济世界的中心，在那里，历史的太阳照射出最绚丽的色彩；在那里，显示在人们面前的是昂贵的价格、丰厚的工资、华美的商品，还有银行，有利可图的工业，资本主义式的农业；那里也是长线交易、金银、硬通货和信用证件流动的起止点。走在前面的一整套经济现代特色融汇在那里：15世纪游历威尼斯的人，17世纪游历阿姆斯特丹的人，18世纪游历伦敦的人，今日游历纽约的人，这一切皆可尽收眼底。通常，尖端技术也在那里，连同与之并蒂的基础科学。各种“自由”亦然，它们不完全是神话，也不完全是现实。你们可以想一想人们称之为的威尼斯的生活自由是个什么情形，或者荷兰的各种自由是个什么情形，或者英国的各类自由是个什么情形！

中间国家是中心国家的邻邦和竞争对手,到了中间国家,生活水平就差了一个成色。在这些国家里,自由的农民很少,自由人很少,交易不能善始善终,银行和金融机构亦不完备,而且常由外部操纵,各种工业相对来说更是传统型的。18世纪的法国美且美矣,然其生活水准却不能与英国同日而语。英国人的绰号是约翰牛,约翰牛“营养过剩”,吃的是肉,穿的是皮鞋;法国人的绰号是雅克·好好先生,好好先生体质虚弱,吃的是面包,脸色苍白,年龄未到便已呈现老态,穿的是木鞋。

然而,边缘地区与法国又差了十万八千里!且用一个座标来说明问题。在1650年左右,世界的中心是小小的荷兰,或更准确地说,是阿姆斯特丹。中间地带,即二类地区,是非常活跃的欧洲的其他部分,即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国家,英国,莱茵河和易北河地区的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罗马以北的意大利。边缘地区在北部,苏格兰,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汉堡—威尼斯一线以东的欧洲,罗马以南的意大利(那不勒斯,西西里)。还有,在大西洋的彼岸,欧化了的美国是典型的边缘之地。如果剔除了加拿大和美国初始阶级的英属殖民地,那么,整个新大陆都带着奴隶制的标记,同样,直至波兰和波兰之外的中欧边缘是第二代的农奴区,也就是说,农奴制如同在西方那样大致消失之后,在16世纪又被恢复起来。

总之,在1650年,欧洲经济世界是一些社会的重叠与共存的局面,阶梯的上属是荷兰的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的

社会，下属有农奴社会和奴隶社会。这种同时性和同步性使得各种社会的问题一起存在着。其实，资本主义正是靠这种规则的分级而生存的：外围地区养活中间地区，尤其是中心地区。什么是中心？不就是统治尖顶，不就是整个大厦的由资本主义构成的上层建筑吗？观物有变向角度，如果说中心依靠外围的供应，那么，外围则依靠中心的需求，中心向外围发号施令。弄来弄去，还是西欧将奴隶制搬到了新大陆的框架里，而且加进了新的创造；弄来弄去，还是西欧出于自身经济的要求将二茬农奴制导入东欧。由此可以看出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论断的分量：资本主义是世界不平等的产物；为了自身的发展，它需要国际经济的默契。在一个显然非常巨大的空间里，它是专横组织所生下的儿子。在一个狭窄的经济空间内，它不会生长得如此茁壮。若不借助别人卖身的劳动，它大概压根儿就生长不成。

人们通常讲的是渐进的模式：社会由奴隶制发展为封建农奴制，再发展为资本主义。而上述的论点却是另外一种解释。这个论点强调了同时性，强调了同步性，这个同步性太非同一般了，以至于它不可能不具有巨大的意义，不过，这个论点并不解释一切。它也不可能解释一切。至少解释不了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即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起因这一点，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在欧洲经济世界之外所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直至 18 世纪末期，直到出现一个真正的世界

经济的时候,亚洲这一边曾有过一些组织得和开发得都很坚实的经济世界:我想到的是中国、日本、印度——南亚诸国板块、伊斯兰国家。按规矩,而且按实情,可以说,这些经济体和欧洲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是表层的,仅仅涉及到用以交换钱币的奢侈性商品——特别是胡椒、香料和丝绸,还可以说,这一切与经济实体的分量相比既轻且微。这是无疑的,然而,这些狭窄的、所谓表层的交易却是双方的大资本所独辖的,而这一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巧合。我甚至最终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即每个经济世界常常是由外部操纵的。伟大的欧洲历史把这一点讲得扎扎实实,没有人认为它错误地强调了以下的事件:伽马(Gama)<sup>①</sup> 1498年抵达卡利卡特(Calcutta,印度南部大商港);荷兰人豪特曼(Houtman)<sup>②</sup> 1595年在爪哇岛的大城市万丹抛锚;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sup>③</sup> 1775年在普拉西取得的胜利使孟加拉归属了英国。命运是乘着风火轮而来的。命运来自远方。

---

① 伽马(Gama, 1460 - 1524):葡萄牙航海家,由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海路开拓者,1524年受命为印度总督。

② 豪特曼(Houtman, 1540 - 1599):荷兰探险家和商人,1596年到达东印度群岛,与爪哇等地的土王建立了贸易关系,同年满载着香料返回阿姆斯特丹。

③ 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 - 1774):英国首任孟加拉行政长官。1743年去印度,在东印度公司当职员。孟加拉原由莫卧儿皇帝所派的总督统治。1757年6月,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了孟加拉总督西拉吉·乌德·多拉,英国从此成为孟加拉的主人。

### 第 三 节

在欧洲曾存在前后相接的经济世界，它们是由一些中心轮番造就并推动发展的，这一点我已同你们谈论过。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在 1750 年之前，这些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心一直是一些城市，实际上是些城邦。关于阿姆斯特丹，可以说，到 18 世纪中叶，它仍然以经济统治着世界，它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城邦。在它的背后，联合省的统治不过是个影子而已。阿姆斯特丹独坐江山，它是从拉美的安的列斯群岛，从日本沿岸，总之，从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明亮的灯塔。可是，到了启蒙世纪中叶，一个不同的时代开始了。君临天下的伦敦不再是一个城邦，它是英伦三岛的首都，英伦三岛赋予它一个国家市场所具有的所向披靡的力量。

因此，有两个阶段：城市的建制与统治阶段；全国的建制与统治阶段。这一切可以一带而过，之所以一带而过，不仅仅因为你们了解这些熟知的事实，不仅仅因为我已谈论过，还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这些熟知事实的整体才是重要的，这是由于从这个整体着眼，我们才能以相当新的方式提出并看清资本主义问题。

直到 1750 年，欧洲先后围着一些重要城市转，这些城市的角色将它们变成了大明星：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不过，在 13 世纪的时候，在这一等级的城市

之中。尚无一个能支配经济生活。这倒不是因为欧洲尚未形成一个有结构、有组织经济世界。地中海一度被伊斯兰教征服,后来又重新向基督教徒开放,地中海以东的贸易遂向西方提供了一个辽远的、颇具魅力的活动天地,没有这样一个活动天地,也就不会有名符其实的经济世界了。两个先导地区已显然自成一体:南方的意大利,北方的荷兰。整体的重心于是便固定在两区中途的香槟与布里的交易会。这些交易会是人为的、非自然的城市,与之相连的有一个称得上是大城市的特鲁瓦(Troyes)和三个二等城市:普洛万(Provins),巴尔苏尔奥布(Bar-sur-Aube),拉尼(Lagny)。

若说这个重心在虚空之中,则未免言过其实,而且,它离巴黎并不太远。当时的巴黎在圣路易君主政体的光辉中,在其大学的声名远播中,已是一个大商埠了。人文主义史学家朱塞佩·托法宁(Giuseppe Toffanin)看准了这一点,他写过一本书,题目颇具特点:*In Secolo senza Roma*〔没有罗马的世纪〕。请你们领会,这里指的是13世纪,罗马的文化王位失落在巴黎手中,不过,要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当时巴黎的光辉与香槟的热热闹闹的交易会有着内在的联系,香槟的交易会是一个几乎不中断的国际聚会的场所。北方,即广义的荷兰——从马恩(Marne)河边到须德(Zuider)海的一大片纺织毛、麻的家庭作坊——所生产的呢绒和布匹与意大利商人与借贷人所掌握的胡椒、香料和钱款进行交换。交换虽然局限于奢侈品,却足以启动一台

巨大的商业、工业、运输和信贷机器，足以将这些交易会变成了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

香槟交易会在 13 世纪末没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从 1297 年建立了地中海与布鲁日 (Bruges) 之间的直接海运线——海路压倒了陆路；由于有了辛普朗 (Simplon) 隧道和圣哥达 (Saint Gotthard) 隧道，德国城市之间的南北通道的作用发挥出来了；最后，意大利城市工业化了：过去，意大利城市只满足于染印北方的呢绒，现在，它们自己也能织造了。在佛罗伦萨，毛纺工艺发展起来了。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在 15 世纪，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之不久之后发生的黑死病悲惨疫情，发挥了它惯常的作用：香槟贸易的最强大的伙伴意大利胜利地经受了这场考验。它变成了，或者说重新变成了经济生活的不可否认的中心。从此之后，意大利把持了南北之间的交易。再者，经波斯湾和红海从远东运来的商品以及从地中海东部抵达的商队首先给意大利打开了欧洲所有市场的大门。

实际上，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四座强大的城市分别统领着，1381 年，在热那亚失败之后，开始了威尼斯的长期统治。此番统治并不一帆风顺，却也历时一个世纪以上。在此期间，威尼斯是支配着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商埠，而且威尼斯对于全欧洲来说也是远东抢手货的主要集散地，欧洲各地的人都蜂拥而至。16 世纪，安特卫普取代了圣·马可之城（即威尼斯），原因在于安特卫普变成了胡

椒的储存库，葡萄牙通过大西洋的海路大量进口胡椒。因此，埃斯考河（Escaut，比利时称为施海尔德河）的港口便成为大西洋和北欧交易的巨大中心。后来，多种政治原因又将热那亚置于统辖地位。这些政治原因说来话长，在这里就不谈了，它们与西班牙人在荷兰进行的战争也有关系，圣·乔治之城（即热那亚）的财富并不仅仅建立在地中海以东地区贸易的基础之上，还建立在新大陆的贸易、塞维利亚的贸易、从美洲矿区源源而至的白银基础之上。热那亚当时成了美洲白银在欧洲的集散地。最后，阿姆斯特丹令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东部，再到印尼的摩鹿如（Molucca）群岛，在这样一个广袤的区域内，它长期——历时一个半世纪以上——行使的主导权主要取决于它在两个方面的无可争辩的控制力。一方面它控制了北方的商品，另一方面控制了桂皮、丁香等“细香料”。它相当迅捷地掌握了这些“细香料”在远东的一切货源。阿姆斯特丹的控制已几近垄断，这使它几乎处处皆可随心所欲地行事。

让我们把这些强可敌国的城市放在一边，抓紧时间来谈一谈国家市场和国民经济这个大问题。

由于物质生活的需要与革新，国家将政治空间演革为协调的、统一的、其活动都能向同一方向进行的经济空间，这便是国民经济。只有英国提前实现了这一业绩。在论及英国的时候，人们总要谈到革命：农业革命、政治革命、金融革命、工业革命。在这一系列革命中，还须加上一场建立了



国家市场的革命,至于给它起个什么名字,那就悉听尊便了。奥托·欣泽批评了桑巴特,他是强调这项演革重要性的最初几个人之一。此一演革与这个幅员相当狭窄的国家拥有相对充裕的运输手段密切相关。沿海航运之外还有密布的河流与运河网,以及大量的车辆和驮重牲畜。英国各省通过伦敦交换产品并安排出口,更何况英国很早就解脱了内部关税和通行税。另外,英国于1707年与苏格兰,1801年与爱尔兰实现了联合。

你们也许会想,联合省(指荷兰)早已实现了上述业绩。但是,联合省的领土乃弹丸之地,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口。在荷兰资本家的谋划中,国内市场无足轻重,他们完全转向了国外市场。至于法国,则面临着太多障碍:经济落后,幅员相对过广,人均收入太少,内部联系困难,最后还有,它的中心的形成不够完善。以当时的运输情况衡量,国土过于广阔了,国家也太分散,太无组织了。在一本引起许多议论的书中,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ox)轻而易举地指出,当时至少存在着两个法国,一个是沿海法国,充满活力、灵活、受到18世纪经济发展的直接刺激、与内地很少联系,因为一切视线都转向外部世界了;另一个是内陆法国,土气、保守、视野局限于本地、意识不到国际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经济好处。而政权恰恰一贯掌握在这第二个法国的手中。而且,国家政府中心所在地巴黎处于内地,连法国的经济首都都不是。自从1461年建立交易会以来,里昂长期发挥着经济首都的作用。只是在1709年和萨米埃尔·贝尔纳

(Samuel Bernard)<sup>①</sup>“破产”之后,巴黎方为法国市场的经济中心。在1724年改组巴黎交易所之后,这个中心才开始发挥作用,但为时已晚。马达虽然在路易十六时期已经启动,但却无力推动和控制法国的全部经济空间。

英国的命运简单多了。英国只有一个中心,即伦敦。从15世纪起,伦敦便是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中心。这个中心形成得很快,同时也按照自己的意愿,即按照当地大商人的意愿塑造着英国市场。

另外,英国的岛国地位帮了它的忙,使它可与别国分道扬镳,可以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涉。1558年,托马斯·格雷沙姆(Thomas Gresham)创建了Stock Exchange(证券交易所),这是针对安特卫普的动作。1597年,关闭了汉萨同盟<sup>②</sup>在伦敦的会计所并取消了该所原主人的特权,这是针对汉萨同盟成员的举措。1651年,颁布了第一个航行法,这是针对阿姆斯特丹的行为。在那个时期,阿姆斯特丹统辖着欧洲商业的命脉。但是,英国对它有施压的手段:由于风向的关系,荷兰帆船经常需要在英国港口停泊。这大概就是荷兰接受英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而不能容忍其他任何

---

<sup>①</sup> 萨米埃尔·贝尔纳(Samuel Bernard, 1651 - 1739):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手下的财政官。

<sup>②</sup> 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中世纪由德意志北部城市和德意志海外贸易集团创立的商业组织。到了14世纪,参加同盟的城镇发展到100个,形成了从俄国的诺夫格罗德到英国伦敦的贸易轴心。从15世纪起,由于各城镇的独特利益超越了共同利益,同盟开始消亡。1669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

人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原因。总之，英国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好地保护了它的国家市场和它的新生工业。英国取胜于法国，其过程是漫长的，其初始是颇早的（我认为始于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 Treaty of Utrecht），自1786年（艾登条约）凸显于光天化日之下，到了1815年便是辉煌眩目的了。

随着伦敦登临顶峰，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因为，英国的经济优势也扩展到政治领导权方面，而此一优势之确立标志着一个绵延数世纪的时代结束了。城市统领经济的时代结束了。欧洲虽有汹汹的来势和贪多务得之心，它当时的一些经济世界也不可能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将外部世界把握住。同样，这些经济世界的时代也结束了。英国取代阿姆斯特丹的成功，这不仅仅是历史业绩之重扬，而是历史业绩之超越。

征服世界是艰难的，其中不乏事变与悲剧。但是，英国的主导地位维持下来了，克服种种障碍。历史上第一次，欧洲经济世界排挤着其他的经济世界，谋求支配世界经济并在全球范围内与世界经济结为一体。普天之下，一切障碍都得首先为英国人，同时也为欧洲人让路。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14年。安德烈·西格福雷德<sup>①</sup>生于1875年，本世纪开始时也只有25岁，很久之后，他怀着无穷

---

<sup>①</sup> 安德烈·西格福雷德(André Siegfried, 1875 - 1959): 法国地理和社会学家。有关政治社会学和地理经济学著作颇丰。

的余味回顾道，在一个边界纵横交错的世界，他竟然只用一张名片作为身份证件作了环球旅行！这真是 *pax britannica* [英国统治下的和平] 的奇迹，当然，不少的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 第 四 节

我们现在要谈论的英国工业革命是一次使英国焕发青春、从而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沐浴，是一份使英国走向强盛的契约。请你们不必担心：我不会狂热地、喋喋不休地投入这个历史大题目里去。实际上，这个大题目的讨论一直延续至我辈还在纠缠着我们。工业仍然在我们身边，仍然是革命性的、咄咄逼人的。请放心：我只向你们阐述这场运动的初始，我避免参与英、美历史学家率先、其他国家历史学家随后所投入的引人注目的争论。再说，我所阐述的问题只限于指明在多大的程度上英国的工业化符合我所勾画的简图与模式，在多大的程度上英国的工业化纳入了已经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变化的资本主义总体历史。

让我们说明一点，革命一词，在这里如同惯常的情况那样，是反其意而用之的。*révolution*，在词源上，指的是一个旋转着的轮子、一个旋转着的星球的运动，即一个“快速”的运动：转动一开始，人们便知道它会相当快地结束。而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工业革命) 却颇为特殊，是一个缓慢的运动，其开始阶段不易被人察觉。亚当·斯密本人就生活

在这场革命的最初迹象之中,却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到。

革命的进程是很缓慢的,这就说明它是困难的,是复杂的。当前的情况不正说明了这一事实吗?在我们眼前,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国家正在实行工业化,但艰辛异常,受挫频仍,缓慢得让人一看就觉得很不正常。这一回,问题出在农业部门没有跟上现代化;或者因为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或者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另一回,麻烦来自当地的资本家不要当地的投资,而宁取更为可靠、更有利可图的外国投注;或者由于国家机构的浪费和渎职;或者因为进口的技术不适合国情,或者因为进口技术的价格太贵,影响了成本;或者由于出口补偿不了进口;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国际市场跳出来与你作对并且最后得逞。革命不再是一件需要创造的事物,各种革命模式也任人取用,可是上述种种不幸的遭遇依旧产生。乍看起来,一切本应容容易易,可是什么事情干起来都难得顺顺当当。

实际上,所有这些国家的形势不正使人们回忆起英国产业革命之前世界上所发生的情况吗?也就是说,许多老的革命在技术上本来存在着成功潜在的可能性,然而却失败了。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经了解水蒸气的力量,但仅仅用在了玩乐上。罗马世界掌握了重大的技术与工艺成果,这些成果不止一次地穿越了中世纪前期的几百年,到了12和13世纪再获新生,然而这一切并未获得人们的关注。在这些复兴的世纪里,欧洲成倍地增加了罗马早已使用过的水磨房,也成倍地增加了风车磨房,神奇般地扩充了能源:

这已经是一场工业革命了。中国似乎在 14 世纪发明了焦炭炼铁,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无疾而终。在 16 世纪,深层矿井里安装了整套的提水、泵水和排水系统,但是,作为工厂先驱的这些首批现代化作坊,在吸引来资本之后,却很快地成了效率下降规律的牺牲品。在 17 世纪,泥炭的使用面在英国扩大了,约翰·内夫颇有道理地说这是英国的首次革命,但这是一场没能扩展并导致大变化的革命。至于法国,工业进步的征兆在 18 世纪是清晰无误的,技术发明一个接着一个,基础科学至少与英国的基础科学一样出色。可是,决定性的步伐是在英国迈出的。在英国,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宛如天造地设一般,而这正是世界上第一场工业革命所提出的引人入胜的问题,这场革命也是现代历史最大的断口。它到底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呢?

英国历史学家是如此大量地研究了这些问题,以至于外国史学家很容易在英国史学家的争吵中陷入迷津,因为外国史学家理解的是每一回单独的争吵,而将所有的争吵聚集在一起却不能使问题的解释简单多少。现在唯一肯定的东西是,那些图方便的、传统的解释被抛弃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工业革命视为一个整体现象,视为一个进程缓慢的现象,因而蕴涵着深远的起因。

英国机械革命,即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生产的 Boom (繁荣景象)从 18 世纪末一直拓展到 19 世纪开外,形成了一种奇迹般的全国性增长,发动机无一处咬刹,阻滞发展的瓶颈现象无一处产生。若是我们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我刚刚

说到的当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困难与混乱的增长,英国的情况难道不是最令人惊奇之事吗?在英国农村,男人流失一空,而生产能力却依旧维持着。新生的企业家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熟练的或不熟练的劳力。尽管物价上涨,国内市场继续发展着。技术也跟上来了,源源不断地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服务。国外市场一个接着一个被打开。甚至利润下降,譬如在第一期繁荣之后棉纺工业利润狂跌,也没有引发危机: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流向别处,铁路接续了棉纺。

总之,英国经济的各个部门都顺应了产生突然大发展的需求,没有出现阻滞,没有出现故障,那么,难道不应该将此归功于整个国民经济吗?再说,在英国,棉纺革命是从本土、从普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发现往往是由一些工匠完成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企业家出身寒微。投入的资金容易筹措,开始时数额并不大。在英国引起惊人变化的因素不是已经到了手的财富,不是伦敦,不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伦敦才控制了英国的工业。继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之后,很快出现了人们称之为的工业资本主义。背负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与生气,甚至是基础经济的力量与生气,是善于创新的小工业的力量与生气,也是生产和交换总体运作的力量与生气。人们以钦佩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例子。工业资本主义是随着底层经济而成长、成形和壮大的。

形势的因素实际上将英国造就成广阔世界的无可争议

的主人。若是没有这些因素,英国革命肯定不会是当时那个样子,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多次征战帮了英国革命的大忙,这是大家都知晓的。英国的棉纺繁荣之所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在很长的时间里存在着,那是因为其发动机不断地被新开辟的市场启动着。这些新开的市场是:葡属美洲、西属美洲、土耳其帝国、印度……虽然并不情愿,然而全世界却充当了英国革命的有效帮凶。

这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方只同意通过(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从“内部”进行解释,另一方只顾看到从“外部”对此予以解释(实指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剥削)。依我看,这场争论是空洞的。事实并不是谁想剥削世界谁就能剥削世界。要剥削世界,事先必须拥有慢慢成熟起来的强大力量。肯定无疑的是,这个强大的力量是自身的慢工而形成的,又通过剥削他人而得到加强,在这两个并行的进程中,它便和其他国家的力量拉开了距离。因此,上述两种解释(内因论与外因论)是交织在一起的,难解难分。

我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的讲解是否已使你们信服,我不敢肯定。作为我讲解的结尾,我向你们吐露我对当今世界和当今资本主义的想法,其依据既是昔日之世界,亦是昔日之资本主义,也就是我所了解的和我试图向你们描绘的昔日世界与昔日资本主义。我现在吐露的想法能否使你们信服,我就更加怀疑了。然而,谈古不正是要论今吗?对于历史的解释不正须通过古今的对证而证实吗?



诚然,今日资本主义的规模与范围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它是随着基础交换和运作手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展而水涨船高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怀疑资本主义的性质产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

三个证据支持我的看法:

——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以世界为存活的范围,至少它是向全世界伸展的。它当前的大目标是:重整全球主义的旗鼓。

——它一贯地、顽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实上的垄断,不顾在这方面反对它的激烈行动。今天,人们将其系统称为“组织”(organisation),这个组织继续在绕开市场。人们认为这是个真正新的事实。然而,错了。

——更有甚者,不管人们通常怎么说,资本主义并不涵盖全部经济,并不涵盖进行劳动的全社会。它决不可能将这二者都包含在一个系统中,即资本主义的、被误认为完善的系统。我已给你们说过的三层分野——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附属物)——现时仍然具有对事物进行区分、对问题进行解释的非凡价值。对此价值,只要从内部了解一下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某些现时的、有特点的活动,也就足以使自己信服了。在底层,甚至在欧洲,仍存在许许多多游离于国家财务制度之外的自身消费和服务产业,仍有许许多多的手工摊铺。在中层,以一个服装加工厂为例吧:在生产和销售中,它受制于严格的、甚至严酷的竞

争规律。稍有不慎或懈怠,就立即溃不成军。在顶层,我只想给你们列举我认识的两家大公司,它们是所谓的竞争对手,也是欧洲市场上唯一的一对竞争对手,一家是法国的,另一家是德国的。可是实际上,买主向这家或那家订货,两家公司都无所谓,因为,不管在这方面采取什么途径,它们的利益是融合在一起的。

这样,我更加坚信我自己慢慢归顺的意见,即资本主义是地地道道从顶端的、或伸向顶端的经济活动中衍生出来的。如此说来,这个强悍的资本主义是由两层垫子托持着的,一层是物质生活,一层是结构紧密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代表的是高利润领域。鉴此,我把资本主义定位在顶点上。你们可以责怪我的说法,但我不是唯一持此见解之人。在列宁 1916 年撰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他两次指出:“资本主义就是发展至最大程度的商品生产;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sup>①</sup> 但是,1917 年的这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却是个古老的、非常古老的现实。

记者、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是极其经常地忽视了历史的范畴与前景。许多历史学家不也是这样的吗?他们新研究的历史时期好像是一个自在的孤立

---

<sup>①</sup> 引语中的第一句话,在《列宁全集》权威的中文版中是没有的。鉴于列宁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语言,也许这句话在某版本内存在过,也可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概括了列宁的想法——译注。

的时期,自生自灭。列宁,这个深邃的思想家,在1917<sup>①</sup>年的这同一本小册子里也这样写:“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这些话大可商榷: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垄断的,商品和资本从未中止过齐头并进,因为资金和信贷从来就是触及和打开外部市场最可靠的手段。远在20世纪之前,资本输出一直是一个日常的现实。佛罗伦萨从13世纪便输出资本了,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热那亚16世纪也在输出资本。18世纪,资本在全欧洲和全世界游动。使用金钱的方法、手段和花招并非萌发于1900年或1904年,这一点还用我说吗?资本主义什么花招都会耍,昨日如同今日,其特点和力量在于能一招不灵,再施一招,一式无效,再用一式。能够视情势而十易其计,而千变万化,自身却能相当好地保持不变、依然故我。

至于我,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当代之人,我所抱憾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如同在社会主义世界一样,人们拒不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西方,对于抨击资本主义恶行的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回答道,相比之下,此乃小害,是自由经营和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负面。我对此全然

---

<sup>①</sup> 作者谈及列宁的小册子及其内容时,使用了1916和1917两个年份,其原因是,该书是列宁为年上半年在瑞士写成的,1917年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为名在彼得格勒出版——译注。

不信。从一个甚至在苏联也能感触到的动向来看,有些人  
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迟钝而忧虑,并想给它注入更多的“自发性”  
(我把话说白了:更多的自由),对他们的回答是,相比之下,此  
乃小害,是摧毁资本主义祸害所必然产生的负面。我对此也全然  
不信,然而,我心中的理想社会能有吗?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它在  
世界上会有许多信徒!

作了这一番泛论之后,我的讲解该就此打住了。但是身为  
历史学家,我还有最后一句心里话要向你们讲。

治史永远是往复不已、从头开始的。历史永远在修撰中,  
永远在推陈出新。史学的命运与人类一切科学的命运无异。因  
此,我不相信我们现在编著的史书能够用上它几十年、几百年,  
没有一定不变、永远受用之书,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我对资本主义和经济的评注是基于对资料广泛的查考和对  
书刊大量的阅读,但是,到头来,我所依据的数字还不够多,也不  
够连贯——总之,质化多于量化。提供生产曲线、利润率和储  
蓄率的专题研究、开列出可靠的企业财产清单、对于固定资本  
的耗损拿出一个哪怕是约莫估计的专题研究,皆如凤毛麟角。  
在这些方面,我试图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寻求更为准确的资料,  
但收效甚微。

我无良方,只好自封于我给你们讲解的圈子里,依我之见,  
在这些解释之外,顺着刚刚谈到的方向,倒可能寻得一条出路。  
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而进行分割,将事物分割成三片或三段,  
这就扭曲了异常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现实,使之

支离破碎。说实在话,得抓住整体才能同时理解不同的增长率变化的根由,而这个变化又是同机器的广泛使用同时出现的。在往昔经济的领域中,如果我们成功地运用某种国家财务制度、某种宏观经济所使用的现代方法,那么,我们就能写一部综合的、概括的历史。跟综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走势,以新的眼光审视一部开拓性的历史著作,即勒内·巴埃雷尔(René Baehrel)所写的一本关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普罗旺斯的书,力图确定“国家预算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联,根据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建议,力图衡量因时期而异的国民生产毛值与国民生产净值的差额,我认为他在这个题目上的假设对于理解现代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以上就是我诚心地向年轻的史学家们推荐的任务。在我写过的书中,我曾不时地打开一个只能让人猜测此等景色的窗口。然而,一个窗口难敷需要。若做不到集体调查研究,至少也得进行有协调的调查研究,这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部未来的历史将是万古不变的经济史。经济会计至多也就是研究国民收入的起落、变化,而不是测定国家物资的总量积累,不是测定国家财富的总量。这个总量是可以得到的,对它必须进行研究。对于历史学家,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对于所有的客观的科学家,前面有如一个全新的美国船,永远值得探索。

## 附 录：终天之见

——介绍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

1985年10月18至20日，在地中海边的美丽小城夏多瓦隆举办了一次布罗代尔著作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该市的研究中心在法国文化部、研究部、教育部、外交部、大学国务秘书处等单位的支持与帮助下主办的。在三天之中，与会者研讨了布罗代尔著作中的三个大课题：地中海、资本主义、法国。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都是国际上知名的记者和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来自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大厅里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83岁高龄的布罗代尔兴致

勃勃地听取了与会者的见解,亲切、直率而又机敏地回答了学者们和听众的提问。布氏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第二代的台柱。传统的史学往往局限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人物史,而年鉴学派则将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经济、社会、甚至心理方面。布罗代尔撰写的《地中海》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近代史学中的力作。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这八个字来论定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恰如其分的。在这次研讨会上,老学者在涉及文化、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处,还情不自禁地倾吐了几段心曲。在研讨会一个多月之后,他便与世长辞了。因此,布罗代尔在夏多瓦隆的谈话,借用法国一句成语,竟成了“天鹅的绝唱”。

研讨会第二天的议题是资本主义。笔者认为,摘要介绍会上的发言与辩论或许有助于读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在1985年那个时候,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位大政治家或哪一位大学者曾预见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对于市场的研究处在一种欲言又止、躲躲闪闪的状态中。而布罗代尔和他的朋友华勒斯坦等人早在此之前便明确将市场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这充分显示了这批人学术功力的深厚和思想的锐敏。今天回头察看,更觉其难能可贵。

这里要作一点说明:本文是这次研讨会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分题概括。采用的是意译而不是直译的方式。在完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选择意译的决定无非是方便中文读者的阅读。笔者在这里面未作任何诠释,更无丝毫的添枝

加叶。

在这次讨论会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该校“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于布氏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作了一个画龙点睛的阐述,并且由此指出了其颇具开拓性的意义。

华勒斯坦说,40年前,市场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看起来是相当清楚的。市场不但将资本主义确定为自身运作的关键因素,而且还用两个相反的命题给资本主义定位:一方面是处于上游的封建主义,另一方面是处于下游的社会主义。那个时候,人们倾向于把封建主义说成是一个市场前制度,把社会主义说成一个市场后制度。今天,已经不可能再使用这种图解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了。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个图解过于简单化了,而是因为它显然是错误的,至少有三点错处,分别涉及三类社会。

首先,自从1945年以来,对于封建社会的研究大大地发展了。研究向我们表明,根本不可以将封建社会看成是在自然经济范畴中的一个封闭的、完全自给自足的结构。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到处都有市场。当然,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与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商品化尚未向全球方向推进。一般来说,市场或在当地,或在远处,很少形成“区域性”的结构。其次,真正存在于世的社会主义近年来对于市场表现出某种经验论倾向。第一,分析家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地、最终地摆脱



世界市场；第二，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都进行一场长期的辩论，其主题是，在国内市场实行某种放开会得到什么好处。在辩论中甚至产生了一个新概念：“市场社会主义”。最后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综上所述，封建社会的现实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都否定了上面提到了理论图解。其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也同样表明了此一理论的错误：布罗代尔的著作正是在这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最近出版的三部著作的精华就在于从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区分出三个要素，而他只把“市场”这个字眼使用于其中的一个要素。特别要指出的是，布罗代尔重新确定了市场和垄断的关系。过去，人们通常将竞争和垄断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两极，而布罗代尔则视之为不断斗争的两个结构，在这两个结构之中，他只把垄断定性为“资本主义”。

这样一来，他就扭转了知识界讨论的方向。他不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因素，而将此要害作用赋予垄断。这是一场看法上的革命。

华勒斯坦指出，从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可以获得三大教益，这三大教益皆与人们过去所认可的思想相悖。过去，人们是将资产者和资本家分类的，将他们分成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为了确定在现代史的某个时期内哪一个部门支配着另一个部门，人们曾经花费了并正在花费着多少笔墨啊！关于某种自然历史的模式，人们创立了那么多的理论，说是资本有一个从商业到工业、再到金融的发展过程。对于农业资本家的作用和存在，有着多少模糊认识啊！

然而，这一切是子虚乌有的问题。布罗代尔明确地指出，大能人总是试图包揽一切的：批发、生产、金融，他们什么都做。只有在一切领域中都占上风的时候方可希冀获取垄断利益。只有落伍者才从事专业经营，也就是说，成为专业的商人或企业家。因此，要区分的不应该是商人、企业家、金融家等等，而是专业户和非专业户。一个是行业的区分，一个是大与小、世界性/地方性/国家性、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的区分，这第二个区分才是布罗代尔所称之为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的区分。

第二个教益并非专属布罗代尔，然而，布罗代尔的著作能够使我们克服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这种障碍阻止人们承认这样一个实情：一切垄断皆具政治性。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证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永远不能扼杀或限制住市场的力量，要想设立非经济性的壁垒，不让人家涉足经济交易，要想将非分的价格强加于人，要想保证非优先性的采购，不依靠某个政治当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布罗代尔定义下的）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

华勒斯坦说，如果这是确切的话，那么，当今世界上的左派与右派的政治斗争的全部含义也就应该改变了。他们的斗争是围绕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法性吗？不是的，过去从来不是，现在仍然不是。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一个组成因素。双方的辩论无非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国家即时行动的受益者。这样一种看法帮助我们

破除政治辩论的神秘化。

最后一点教益是,布罗代尔可使我们收敛对于重大技术逐步的热情。重大的技术进步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信徒们所津津乐道之事。实际上,每次技术大突破对于垄断领域便是一次新的推动。每当市场扩大了股民的人数、降低了成本、价格和利润,因而也就侵占了垄断的地盘之时,有人(是谁呢?)便酝酿搞一项技术飞跃,以此再建一个封闭的、在30年内可获高额利润的领域。

华勒斯坦说,他赞扬了布罗代尔,但同时也要指出一种危险,即滥用布罗代尔论点的危险。一些人渴望绝对的自由,反对压制他人的大亨,这些人很容易将布罗代尔的论点引向一曲新的(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华勒斯坦说,为此,他想谈一谈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在过去近200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把自由、平等、博爱分析为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且一直在研讨这样一个问题:在多大的程度上这三个概念是协调兼容的。譬如说,自由和平等难道不正是导致博爱的反面吗?等等等等。也许,根据布罗代尔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我们应该对这三句口号进行重新认识。市场是小人物的领域,是自由的领域,市场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反对垄断,而垄断是大人物的领域,是压制他人的领域,垄断只有依靠国家的活动才得以存在。在此情况下,反对政治不平等的斗争,反对经济不平等的斗争和反对文化不平等的斗争不正是同一场斗争吗?垄断之所以能处于统治地位,是因为它在经济角斗场上否定了自由和

平等。进而也就在政治舞台上和文化舞台上否定了自由和平等。华勒斯坦强调说,在我看来,参与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世界就是意味着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争,即为人类的自由与博爱而斗争,因为,这样一场斗争的逻辑不允许世界上存在着人下人。这是一个(对于传统观念的)扭曲:布罗代尔定义下的市场所取得的胜利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表征,反而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表征。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扭曲啊!

华勒斯坦说,我们讨论的显然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很难创建的未来。让布罗代尔所界定的市场取得胜利绝非易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500年的历史乃是这个市场屡屡失败的历史。布罗代尔给予我们的唯一希望是,这个市场,或者更确切地说,组成这个市场的人,从未认输。每天清早,这些人又重新投入同一场艰巨的斗争,为了压制那些压制他人的人,在经济上控制他们的墙脚,在政治上破坏他们的基础。

华勒斯坦的这番讲话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响。

### 经济世界:中心与外围的差距

这次研讨会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是由经济学家、法国《世界报》的著名记者保尔·法布拉(Paul Fabra)主持的。

在开场白中,法布拉赞扬了布罗代尔的学术成就,称布氏是“一位非凡的指导者”。他还指出,大城市的“组织作

用”，连专业的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却被布罗代尔所揭示。布氏即使不是第一位，也是最初的揭示者之一。这里所说的大城市即中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16世纪的安特卫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尔后的伦敦和今日的纽约。

然而，法布拉对于布罗代尔的“市场与资本主义有别”的基本论点表示了异议。他说：“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资本主义是一个上层建筑，应当细心地将之区别于‘市场经济’。在《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重要著作中，作者划分出15世纪至18世纪的各个阶段，指明了这两个假设有别的现象（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地位和性质。这个论点所带来的问题多于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正符合一切大的解释定式的情况。”法布拉接着说，布罗代尔告诉我们，一种解释定式如同一艘船，先在陆上建造，然后下水。这船能浮在水面吗？能航行吗？现在我们也要问，他的船能开动吗？

法布拉说，布罗代尔的论点令人生疑，其原因可能是在涉及宏伟的交换历史时缺少了一个明确的交换概念。他说，布罗代尔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的论点。加尔布雷思认为，大企业有实力“统辖”市场。布罗代尔甚至这样写道：“对于大企业来说，经济规律是不存在的。”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外向性”的论点正是建立在这种说法的基础上。

法布拉顺势而下：布罗代尔把市场经济视为联系生产世界和消费世界的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布罗代尔所说

的市场经济是生产者在思想上仍然关心使用价值的一种经济，而资本主义则只关心交换价值。在这个概念中，难道没有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间接赞颂吗？

法布拉提出了两点具体的质疑，一个是经济世界的中心与外围的差距问题，一个是竞争与垄断的关系。

法布拉指出，根据经济理论，市场有助于将成本拉平，也将利润拉平。而布罗代尔却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即建立在平等关系之上的交换导致了不平等的建立。布罗代尔有一种看法，一个经济世界的外围注定比它的中心地区贫苦。“难道人们能够二话不说地接受这个看法吗？在我看来，事实部分地否定了这个看法。今天，西方世界是围绕着美国而组织起来的，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赶上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布罗代尔在答复中首先指出“法布拉试图责难我们所谓的经济世界。开门见山地说吧，因为这个词组不属于经济学家们的地道的语言……如今有一个经济世界，这就是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构成了一个相当紧凑的经济世界，其中心暂时位于纽约，欧洲所具有的不是一个外围的地位，而是一个‘中心周围’的地位。保尔·法布拉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是决定性的论据，对我说，‘这个半外围的欧洲的生活水平已经赶上了美国的生活水平，这就与你新提出的见解产生了矛盾。’我不认为你的论据很充分，因为你只用了一个指标，即欧洲的生活水平（我情愿德国、瑞士、甚至法国的

情况如此,但肯定英国不然)与美国的生活水平相等。但是,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长期的动向,是一个长期的现实还是一个暂时的现实。需要了解这个水平差维持得住还是维持不住。对于一个经济世界,要靠长期判断。你若能回答我,我将感到高兴。”

法布拉对老学者说,你的论据太狡巧了,我回答不了,你自己也回答不了。

布罗代尔接应道:“不,我能够回答!因为结局还没有出现。过50年再看……”

法布拉:如果需要等50年再看的话……

布罗代尔:我有很大的耐心,我能等50年!

法布拉:如果在经济世界里有一个统治中心,其生活水平高于周围世界,更高于边远地区,这种水平差可能由于外原性因素,也就是说,非经济性因素。而经济性因素是推动事物走向均等化方向的。在这方面,市场发挥着某种作用。当我还是年轻记者的时候,人们对共同市场(即欧洲经济共同体)谈论颇多。当时,有一个强烈反对共同市场的理由,那就是认为不可能把一些很兴旺的地方,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的鲁尔地区,和落后的法国、更加落后的意大利连在一起。认为它们之间的差距只能扩大。孟戴斯—弗朗斯曾预料法国的工人会大量涌向鲁尔。事实上,我看到的却是差距的缩小。

布罗代尔:你把共同市场视如一个经济世界,而它不过是经济世界的一角……

法布拉：在你的论证中，存在一样东西使我为难。假若50年后水平差出现了，换句话说，西欧的生活水平比美国的低了，那就说明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你就说经济世界的中心变了。总之，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占理。

· 布罗代尔：保尔·法布拉，令我吃惊的是你对“外原性”这个字眼的用法。你要说明的意思似乎是，当一些非经济性的事实参与到经济之中时，这些事实就是外原性的。很显然，我们可以说，欧洲在经济世界中的地位不是取决于非经济的东西，而是取决于其整体经济。一个经济世界的中心一定是一个高于别的地方的地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中等生活水平高于欧洲的中等生活水平。高级地区是这样——一个地区：高级地区面临的问题与外围地区或半外围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 垄断与竞争的关系

法布拉向布罗代尔提出的第二点具体质疑涉及到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有生产，另一方面有交换。对此，法布拉说：“经济的进步不正是在于逐渐地将生产世界拖入交换帝国吗？不正是分工的结果导致了任务的专业化和企业的多样化吗？跨国公司将它们的工厂和车间分散在多处，正是为了从成本的差异中汲取最大的利益，它们是这方面运动的行家里手。它们有没有能力摆脱市场



规律？这个问题用不着提出，谁都能够看到，它们存在的根基正是充分地利用了市场规律。费尔南·布罗代尔并非没有看到这个现象，但是，他在分析此一现象时只在外围绕了圈子。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受竞争的制约，而掌握了大量积聚资本的资本主义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运营，经得起风险，可以搞鬼作弊……然而，最大的企业都是在国际市场上展开活动的，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即便不是无时无刻地、也经常是最为激烈的。根据布罗代尔的理论，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是小店铺的事，不是超级市场的事。当一位作者（指布罗代尔）写道，竞争处于垄断之下，只供小的和平庸的企业之用，那么，他所参照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概念呢？人们所面对的难道不是一个矛盾的、感情成分大于科学成分的概念吗？”

以上的话是法布拉在开场白中讲的。在后面的辩论中，法布拉对此问题又作了多次表述。他对布罗代尔说：“你认定在你所称之为市场的层面上，竞争是透明的，但市场之上的层面，竞争就不是透明的了。极而言之，能不能把这个说法翻转过来？实际上，在初陋的市场上，透明度并不强：一些小企业进入了大多数的市场，它们连会计制度都没有。在大企业中，可以认定，透明度少说也是相等的。”

这时，布罗代尔承接过法布拉的这个问题，回答道：“这是会计的透明，而不是运营的透明。财会只是构筑运营的一种方式，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份资料而已。”

法布拉并不拘泥于这个细节，继续申明自己的观点：

“我还是要说，上层是会使用、利用市场规律的；它懂得能从中获取什么，因此，它把这些规律拉向自己。（问题的结论）这一步很快就可跨越过去了……不过，我不主动跨越，我只想简单地说，跨国公司十分了解市场是如何运转的，它们有能力将它们的投资与生产配置到能够谋取最大利润的程度。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我们眼下所经历的危机证明了它们是何等脆弱。”

法布拉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见解，他强调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交换经济，因此也就是市场经济。”

布罗代尔答道，那就更换一下“市场”这个字眼吧！不管怎么说，有两种（不同的）交换经济。一种是透明的，其代表便是过去的交易会和市场，另一种是不透明的，其代表便是当年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安特卫普、马赛的大商人。

法布拉仍然未被说服，反驳道，这只不过证明市场尚不完善而已。他还说，大经济学家总还是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他把李嘉图视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曾经说过，一切市场都是垄断性的，其垄断仅只短期而已。李嘉图认为，只要投入到交换的过程中，垄断的地位就保不住，有人能维持得久一些，另一些人只能维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

这时，华勒斯坦参与交锋，针对法布拉的论点说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垄断可能只维持几天）但是，在短期内实现的利润却不只维持几天，而是维持几十年。就以钢为例吧。100年前，钢的生产是很具垄断性。‘卡特尔’这个字

便是由此经历产生的。一些大公司垄断了钢的生产,从中赚得了巨额利润。但是,由于需求面对着的市场是如此的广阔,以致于大家纷纷炼钢:先是印度,后是南朝鲜。结果,出现了一个真正竞争的局面。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日本的大公司便放弃了利润降低了钢产,将此留给了他人。今天,电脑还是个垄断,明天,将是生物技术或别的行当。为了获取大利润,人们危及了垄断,但是,在失去垄断的时候,大钱已经赚到手了。”

布罗代尔听后道:“华勒斯坦的语言正是我的语言,而不是你的语言。保尔·法布拉,‘市场’这个字眼帮着你跟我们唱反调,却无助于你理解我们的意思。”

法布拉:“它不是帮我唱反调,而是帮我为你们的言论定位。依照您所选择的长期观点来看,你们的言论并不绝对否定市场规律。以钢为例,若看过去的50年、甚至100年的情况,它表明,李嘉图默认的先垄断、后市场的轮转是存在的。”

最后,布罗代尔就此主题作了一个概括性的发言。话并不长,但给人的感觉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不再细究具体的问题,而是直抒胸臆。他说:“对我来说,在经济领域内,高层次运营的特点就是从一种垄断转向另一种垄断的本领……保尔·法布拉刚刚提到我看重长期过程。并不是因为我看重它,它就具备了特殊的价值,而是因为(研究问题不可仅仅着眼于短期的、孤立的事件)长期过程乃是人类深刻的历史……长期过程是什么?长期过程是我所刻划

的(历史)坐标的轴线,我是据此提出这类或那类问题的。你失去了一种垄断?没关系,再掌握另一种垄断便是了!一种垄断的失落便是一种死亡,资本主义的死亡。这个资本主义是祖父和父亲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儿子或孙子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方便之处和它的优越性便是选择的可能性。最有实力的非专业户思情道,我们在干我们的营生,我们不会罢手,我们正专心致力于此。关于跨国公司,它们今天所体现的不是活力的‘杰作’,更像是一种在经济最高层面上的列了项的企业。大企业从来就不是最深刻的技术演变发源地。最深刻的技术演变来自基层。大企业对于这些演变是了解的。但是,当老技术尚能使它们谋取一定的利润时,它们是不会利用这些技术变化的。”

### 资本主义：以赌设喻

法国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热拉尔·若尔朗(Gérard Jorland)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颇有趣的问题：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运作是否是作弊(或曰弄虚作假)的机制；另一个是资本主义是否与当今世界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有关。

若尔朗首先肯定了布罗代尔区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正确性。他说,连经济学家们也承认有两种竞争,一种是完全竞争,即自由贸易,另一种是不完全竞争,即垄断性的竞争。布罗代尔解释说,市场受(完全)竞争制约,在那里进行的变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垄断局面;这

就产生了不平等的交换。那么,我们想知道,在资本主义这个层面上,交换是一场真正的弄虚作假吗?是一个作弊的机制吗?我对此存疑,因为,我不能理解一个像资本主义这样的长期结构会建立在一个弄虚作假的基础上。美国的一个谚语说,可骗一人于永久,可骗众人于一时,却不能骗众人于永久。

对此,布罗代尔答道:我把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上层结构,弄虚作假是这个结构的特性之一。资本主义不会在任何弄虚作假面前退缩。弄虚作假这个词有道德判断的含义,使用它是不适当的。这个词是我使用的,因此我是罪魁祸首。资本主义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弄虚作假者。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对它进行判断,而是弄清它是怎么回事。

若尔朗提醒布罗代尔,他也说过,“资本主义是个作弊的机制”。(笔者注;在法文中,jeu是个多义词,它具有游戏、比赛、赌博、规则、机制、作用、手法、关连等意思。在使用中,有时它是确指的,有时它是双关的、甚至多义的。)

布罗代尔答道:“作弊”这个字眼也暗含着一种判断。那么,就让我们说资本主义是个不同的机制,是一种不同的游戏吧!在经济的三个层面上,一个层面玩的是多米诺,另一个玩的是罗多(一种摸子填格游戏),第三层玩的是国际跳棋。玩法各异。

若尔朗说,使用赌博理论思考经济问题是个内涵丰富的想法。资本主义的机制与市场经济的机制是不同的,这

个不同可以挪用到赌法的不同上。赢钱的机运率可以用数学理论表示，这个理论区分两种赌法。一种是纯粹的赌，从长期观点来看是一种公正的、稳定的赌博（笔者注，如中国的掷色子）。另一种，像数学家所说的那样，则掺入了赌家的技巧（笔者注，如中国的麻将），即一种不稳定的赌博。

对于若尔朗的阐述，布罗代尔甚为欣赏。他说：“你以赌博理论作为参照，这是很完美的，因为它不牵扯任何道德上的判断。”

### 资本主义与世界上的经济差距

若尔朗在发言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的世界上，在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差距，或曰经济上的不均等，这是不是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呢？他说，回答是否定的。以下是他讲话的主要内容：

现代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平等现象是由欧洲的统治造成的吗？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欧洲的统治是“世界历史的难解之结……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实质问题”。

世界的不均等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历史事实。既然如此，它就有一个出现的时间。为此，我想借用保尔·贝罗克(Paul Bairoch)的估算。他查明：用现在的市价计算，在1800年的时候，世界各地(欧洲、中国、印度)的人均国民产值约200美元，都差不多。可是到了1976年，西欧达

到 2325 美元,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才 350 美元。换句话说,在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均等的局面变成了现在不均等的局面。世界的这种不平等有个原因。原因何在?那就是人们称之为的产业革命。

何谓产业革命?如何理解它?我只引用费尔南·布罗代尔明晰的解释也就够了:产业革命就是由木柴和木炭文明过渡到铁器和煤炭文明。这里借用布罗代尔的两个数字:1789 年,欧洲燃烧了两亿吨木柴,到了 1840 年,便降至一亿吨。1790 年,欧洲生产了 60 万吨铁,1810 年升至 110 万吨,1840 年进一步达到 280 万吨。是技术的变化吗?当然是,但它在经济上产生了后果,若是依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snets)的解释模式,人们对此后果是很容易理解的。库兹涅茨以下述的方式解释了 14 世纪以前的前工业化社会和当代的工业经济之间的大动荡(我且将之简化至极):在前工业化社会里,全部的积累资本是毛值资本,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中,全部积累资本为净值资本。毛值资本与净值资本的差别就是其价值的降低。换言之,产业革命之前,社会需要进行储备,需要从消费中留取一些财富,而我们现在也需要这样做,需要留取同样多的财富,但是我们留取为的是日后增加新财富,而他们留存仅仅是为了维持生产机器的运转。在当时的社会里,一切生产工具都是木制的,不结实,易损坏;在当今社会里,生产工具非常耐用,以至于它们的经济寿命短于它们的技术寿命。比如说,今天在工厂里安置

一台机器，可用 50 年，然而 8 年之后便撤换了，这并非因为它不能用了，而是因为又有了吸收了技术进步的新机器。更换设备导致生产能力的提高。正是这种变化，这种固定资产的演变才使得资本主义从 18 世纪的前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过渡为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是以主要为内原性的方式积累资本的。

步入铁器文明，这标志着经济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具有其经济原因，如果说，到了 18 世纪人们才会用煤炭制铁，那是因为：当时英国的燃料是木柴，而生产木柴的老方式的成本变得太高了。那时候，瑞典垄断着铁的大量生产，瑞典遂成为令英国生畏的强国。英国因此应该找到摆脱瑞典垄断的办法。这构成了一个垄断性竞争的例子。换言之，在资本主义中有一种竞争形式，即垄断之间的竞争，通过减少生产成本来争得霸权地位。

在人们所称之为的“棉花革命”中，存在着一模一样的现象。为什么 18 世纪时在棉纺工业中推行了机械化？因为印度是头号纺织品生产国。英国纺织工人的工资是很高的，他们进行斗争，反对削减工资。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反对印度垄断的斗争只有一种方式，那应当是引用机器。这是另一个垄断竞争的例子，令人更为吃惊，因为印度纺织品在欧洲市场上的垄断不是印度人主动搞的，欧洲人自己才是始作俑者。实际上，把印度纺织品输入欧洲的正是英国和荷兰商人。同样，今天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的竞争是由中心国家的资本家挑动起来的。



那么,是不是进行作弊的资本主义造成了世界的不平等呢?我不这样认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恐怕是我们文明的物质基础改变了。资本主义有金融的、商业的、工业的形式,在产业革命之前和产业革命之后,它的运作规则是一样的。

对于若尔朗的这一番宏论,布罗代尔没有表示异议,而是给予了总体的肯定。布罗代尔说:“我认识他好久了,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我从未听过他像今天这样漂亮的论述。但这也不意味着我完完全全地赞同他。”

### 杂谈与随感

在研讨会上,学术性的阐述仅是布罗代尔谈话的一个方面。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他治学的严肃与冷静。另一方面,在涉及到诸如社会与文化等问题时,他娓娓表露了他多年观察与思索的感悟。从这里,透过他自己推开的一扇心扉,人们至少看到了他内心世界的一角,看到了一位老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沉郁忧伤和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企盼。既要读作者之书,亦须知作者之人。出于这一目的,特将他这方面的谈吐内容摘录如下:

——关于不平等问题。在回答法布拉的质疑时,布罗代尔说:你,保尔·法布拉,你试图通过经济规则来解释交换的不平等。这是经济学家的缺点。你提出了一种

内原性的解释，而一个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却倾向于从经济范畴中走出来，去寻求外原性的解释。我看到，经济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移位。就我所知，人类社会没有一个是平等的。当今世界上没有，在历史学家们掌握的历史上也没有。原因何在？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甚至可能在精确科学的领域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接着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社会的不平等，我在人类最初的社会中就看到了，在历史本身之前就存在着，这样，不平等便作为一个基本问题提出来了。说起来会使你们发笑，我用社会的动物性来解释这一基本问题：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在集体中生活，他便是这个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也就不成其为集体。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有位听众问，既然由于人的社会动物性造成了永恒的社会不平等，是否要逆来顺受呢？根据已经分析的事实看来，一个历史学家不应该只是提出他思考的验证，而应提出别的东西，以便承担更大的责任。

对此，布罗代尔答道：“说得对，在我的一生中，我只有两三次亲自投入（左翼运动）。被观察到的史实是脆弱的，它们对于现今并非总有用处，它们也渗透不进现今。为了求得谅解，我想告诉你们，我对让-保罗·萨特一贯十分赞赏。我不认为他什么都对，当我近察他的思想时，我发现，与我相比，他经常是错的。但是，对于他一贯的投入（左翼

运动),我是一贯欣赏的。他一贯投入,我却不然。这是个缺点。我承认。”

——关于人类的劳动与消闲：“供”增加了，“求”便随之增加。“求”能够吞掉一切，以至于，对于未来最为危险的事，就是出现过多消闲的时候。人们是注定要劳动的呀！劳动太能使人忘却命运啦！有朝一日，若是没有了这层护栏，若是有了太多的消闲，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文化政策是依据消闲娱乐而制订的，我不知道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惧怕硬造出来的文化。

——关于未来与自由。有一位听众问：历史的记忆是否决定着我们的演进？布罗代尔答道：很不幸，是这样的。但是，个人的演进，一个社会的演进，一个国家的演进，你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涉及的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群体，那么，尽管它的意志坚强，尽管它进行试验，尽管它具有把事情办好的愿望，尽管它有变革意念，尽管有革命冲击，它却有些像一只被河水载运着的木筏。河水流动得不快。水流若是快的话，人们早就观察到深层历史的现实了。人们没有观察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水的流速几乎是察觉不到的。在我提出的观念和理论中，我的立场是反对人类的广阔自由的，这也是我最大的悲伤之一。每当我就此思索之时，（我看到）人类的自由越来越狭窄。很不幸，恐怕我没有看错。

运动),我是一贯欣赏的。他一贯投入,我却不然。这是个缺点。我承认。”

——关于人类的劳动与消闲：“供”增加了，“求”便随之增加。“求”能够吞掉一切，以至于，对于未来最为危险的事，就是出现过多消闲的时候。人们是注定要劳动的呀！劳动太能使人忘却命运啦！有朝一日，若是没有了这层护栏，若是有了太多的消闲，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文化政策是依据消闲娱乐而制订的，我不知道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惧怕硬造出来的文化。

——关于未来与自由。有一位听众问：历史的记忆是否决定着我们的演进？布罗代尔答道：很不幸，是这样的。但是，个人的演进，一个社会的演进，一个国家的演进，你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涉及的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群体，那么，尽管它的意志坚强，尽管它进行试验，尽管它具有把事情办好的愿望，尽管它有变革意念，尽管有革命冲击，它却有些像一只被河水载运着的木筏。河水流动得不快。水流若是快的话，人们早就观察到深层历史的现实了。人们没有观察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水的流速几乎是察觉不到的。在我提出的观念和理论中，我的立场是反对人类的广阔自由的，这也是我最大的悲伤之一。每当我就此思索之时，（我看到）人类的自由越来越狭窄。很不幸，恐怕我没有看错。

运动),我是一贯欣赏的。他一贯投入,我却不然。这是个缺点。我承认。”

——关于人类的劳动与消闲:“供”增加了,“求”便随之增加。“求”能够吞掉一切,以至于,对于未来最为危险的事,就是出现过多消闲的时候。人们是注定要劳动的呀!劳动太能使人忘却命运啦!有朝一日,若是没有了这层护栏,若是有了太多的消闲,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文化政策是依据消闲娱乐而制订的,我不知道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惧怕硬造出来的文化。

——关于未来与自由。有一位听众问:历史的记忆是否决定着我们的演进?布罗代尔答道:很不幸,是这样的。但是,个人的演进,一个社会的演进,一个国家的演进,你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涉及的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群体,那么,尽管它的意志坚强,尽管它进行试验,尽管它具有把事情办好的愿望,尽管它有变革意念,尽管有革命冲击,它却有些像一只被河水载运着的木筏。河水流动得不快。水流若是快的话,人们早就观察到深层历史的现实了。人们没有观察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水的流速几乎是察觉不到的。在我提出的观念和理论中,我的立场是反对人类的广阔自由的,这也是我最大的悲伤之一。每当我就此思索之时,(我看到)人类的自由越来越狭窄。很不幸,恐怕我没有看错。

运动),我是一贯欣赏的。他一贯投入,我却不然。这是个缺点。我承认。”

——关于人类的劳动与消闲:“供”增加了,“求”便随之增加。“求”能够吞掉一切,以至于,对于未来最为危险的事,就是出现过多消闲的时候。人们是注定要劳动的呀!劳动太能使人忘却命运啦!有朝一日,若是没有了这层护栏,若是有了太多的消闲,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文化政策是依据消闲娱乐而制订的,我不知道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惧怕硬造出来的文化。

——关于未来与自由。有一位听众问:历史的记忆是否决定着我们的演进?布罗代尔答道:很不幸,是这样的。但是,个人的演进,一个社会的演进,一个国家的演进,你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涉及的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群体,那么,尽管它的意志坚强,尽管它进行试验,尽管它具有把事情办好的愿望,尽管它有变革意念,尽管有革命冲击,它却有些像一只被河水载运着的木筏。河水流动得不快。水流若是快的话,人们早就观察到深层历史的现实了。人们没有观察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水的流速几乎是察觉不到的。在我提出的观念和理论中,我的立场是反对人类的广阔自由的,这也是我最大的悲伤之一。每当我就此思索之时,(我看到)人类的自由越来越狭窄。很不幸,恐怕我没有看错。

运动),我是一贯欣赏的。他一贯投入,我却不然。这是个缺点。我承认。”

——关于人类的劳动与消闲：“供”增加了，“求”便随之增加。“求”能够吞掉一切，以至于，对于未来最为危险的事，就是出现过多消闲的时候。人们是注定要劳动的呀！劳动太能使人忘却命运啦！有朝一日，若是没有了这层护栏，若是有了太多的消闲，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文化政策是依据消闲娱乐而制订的，我不知道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惧怕硬造出来的文化。

——关于未来与自由。有一位听众问：历史的记忆是否决定着我们的演进？布罗代尔答道：很不幸，是这样的。但是，个人的演进，一个社会的演进，一个国家的演进，你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涉及的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群体，那么，尽管它的意志坚强，尽管它进行试验，尽管它具有把事情办好的愿望，尽管它有变革意念，尽管有革命冲击，它却有些像一只被河水载运着的木筏。河水流动得不快。水流若是快的话，人们早就观察到深层历史的现实了。人们没有观察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水的流速几乎是察觉不到的。在我提出的观念和理论中，我的立场是反对人类的广阔自由的，这也是我最大的悲伤之一。每当我就此思索之时，（我看到）人类的自由越来越狭窄。很不幸，恐怕我没有看错。